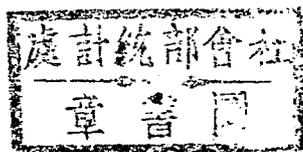


傳記叢書

少年的回顧

鄒魯自著



MG
K807.6
121

傳 記 叢 書
少 年 的 同 願

鄒 魯 著

衛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3 2174 0402 3

凡例

- 一 本書內容全憑記憶，祇能視為大綱。
- 二 普通俗起見，文字力求淺顯。
- 三 所有時代姓名詞，一概照舊（如前清時稱學校為學堂等）。
- 四 凡規模較大之事件，若余祇任其一部份時，則所言者祇限於與余有關之部份（如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祇述及可報廣東北伐軍祇述及兵站總監事等）。
- 五 某一事有關人名，大多數不能追憶者，則從略（例如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後陸軍小學學生曾有數十人，同至香港泰記加盟，因名冊遺失，不能列舉。前年李仙根先生告知渠，即其中之一，而渠能記憶者亦祇有陳濟棠鄧演達二位，若舉少爾多，反失真相，不如從略其餘類推）。
- 六 若干地名與時期，因記憶不濟，不得不從略。
（上海五六兩項，如當時編奉河志，船証憶者，頗為補正）。

學
年
級
級

二

自序

民國二十九年春，某雜誌數次託人要我作少年自傳；我答應了他，因為精神不好，就沒有執筆。自從有了這種諾言，遂不免有時回想到少年的事實，漸漸的成了段落。去年秋天以後，就一段一段的記出來，記到本年春初，把我三十歲以前的事實，大致都記起來了，名曰『少年的回顧』因為太長，雜誌不好登載就單獨出版。因為要出版就不得不要有序言；因為序言一時無從做起，遂拿我四十三歲生辰詩錄在下面，來替代：

『天空星球恆河沙，地球轉為其中一。地球生物幾萬千，人類雜在其中出。地球已小况人類；人類豎有千古橫九洲，我身處此不啻滄海之一漚。呱呱墜地縱百歲，如霧如烟如電逝，我今春秋四十三，渺乎少小安足計？但念已生天地靈為人，便須頂天立地永存真。奪取造化福萬物，形有生滅神無淪。一身幾欲撐天地，百歲應成不壞身。眼前富貴皆泡影，赤一赤來何所幸，眼前險阻甘如飴，動心忍性益猛省。憶我生時境實辛，父母忍饑忍凍鞠育乃成人；少年學資質鈍無所得，弱冠拔劍仗義不帝秦；幾經挫敗遭放逐，屢仆屢起改造國家補歸民。方謂國民從此登衽席，何期年來朝轉滄海昔？敢云雙手挽乾坤，饑溺為懷鄙飽溫。立身行己無他道，返我初生為人之元元；當茲四十有三初度日，有助於中為長言。一漚雖云小，百歲雖云促，暴棄敢自甘，致為人類辱；努力猛向前，日新毋自足。求為人類發異芒，天地同慶日同光。庶幾負乎天地生我父母育我之佳祥，亦安乎我之為我

少年的回顧

二

之五頁。。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三日作者自序於重慶復興居

目次

自序

- 一、從家世說到幼年.....一
- 二、私塾教育.....六
- 三、辦學與入黨.....一四
- 四、廣州讀書與初次革命失敗.....一九
- 五、民意機關服務.....二九
- 六、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三四
- 七、光復廣東與北伐.....四〇

- 八、整頓金融與北上……………四七
- 九、國會內的奮鬥……………五二
- 十、討袁失敗出亡在日本……………六六

一 從家世說到幼年

我的家世，簡單說來，是姻爲民族而堅苦奮鬥的。這於我影響很大。

我的先世原居安徽當塗，唐貞元間，搬到江西南昌。後來又搬到福建，分居邵武郡屬，在泰寧寄較多。宋寧宗時，有一位應龍公，別字景初，在慶元二年中了狀元，官做到資政殿學士。年老乞休，搬到長汀居住。因爲有功德於民，於是地方人士，都立廟塑像以祀之。宋末元兵南下，我祖先不肯屈服，遂由福建擁護宋朝到了廣東。當時傳說這位應龍公，常常顯靈，沿途保佑擁護宋南遷的人民。因此閩粵交界各處，皆遍建立鄧公廟，並且尊爲廣佑聖主，好像各地崇拜關羽岳飛一樣。大埔印山上，就有一所鄧公廟，現在還是香火很盛。

由閩遷粵後，我的祖先初居清溪社窰坑，繼居巖頭，嗣又分居。白墩的簪簪，最後卜居於縣城的儒學內。其餘支派，散居各地。這一批同是擁護宋南遷的人，所以先居南方的人，就稱這部分人爲客家，亦稱爲客人，就是先來的自認爲主人而對於後來的當作客人的意義。客人因爲痛心宋室淪亡，以「讀齊耕田莫做官」，相誡子孫。雖然經過明朝一代，漢族重光，但接着又是滿清人據中國，因此我的先代宦遊者很少，大都遵守不仕異主的遺訓。我的祖父是個商人，我的父親是個縫工兼做生意。

父親名應森，別字石壽，是個獨子。他的幼年時候，祖父不幸逝世，遂成爲孤兒，全賴祖母撫養長大。洪楊之役，縣遭兵燹，家庭一掃而空，我父親祇有一張破帳子，當作被蓋，過了一個冬天。同時一天三餐，有時少吃一頓，有時少吃兩頓；但他却處之泰然。到我解事的時候，還不時聽見他提起「破帳」

髮和「春芹」餐（註一）的故事，來安慰我，鼓勵我。接着縣城又遭水災，把我們房屋沖毀，剩下紙有東歪西倒的破屋兩間。中華魏國紀元前二十七年（清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六日，我就出生在這個地方。

那時候，縣城裏姓鄭的庶有我們一家。我本來有一個哥哥，不幸夭折了。因此父母對我格外鍾愛，就在那縣溪口觀世音菩薩處下了契，叫做澄生，所以在小時候便叫我阿澄。我的家庭除父母和我外，沒有伯叔諸姑，沒有兄弟姊妹；雖然有一個堂伯母，但當我會走路和說話的時候，已逝世了。這種情形，一方面使我體會到仁愛的真義；另一方面養成我獨立奮鬥的精神。

我的父親在縣城裏柳樹街開了一間裁縫舖，因為入不敷出，所以兼營小本生意。每五日到距家約三十千里的福建永定縣下洋母一次，販賣東西。但是自我出世以後，因為照料我，不但停止做生意，就是裁縫舖也搬到家裏來了。

我的母親姓木，性情和藹，勤儉耐勞。家中除父親外，沒有一個幫忙的人；因此事無大小，都由她一人承擔。像她這種家庭，按照本鄉風俗，她每天都有排定的工作：東方發白，她就起床，接着挑水，洗滌飲食用具，燒早飯，餵牲畜；早飯後，到城外山上割艸，做燃料；太陽將要正午，忙着準備午飯；午飯後，到溪邊洗衣服，然後到菜園澆肥澆水；黃昏時候，又回到廚房裏料理晚飯；晚飯後，預備父親和我的洗滌，等到一切做完，才點起燈來，或補縫衣服，或做繡襪，或準備牲畜明日的飼料，或督促我讀書。這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弄得井井有條，減輕了父親的職務，使他能夠安心向外經營。

我的家境儘管貧窮，我的父母儘管辛苦，但是他們鍾愛我的程度，並不因這種環境而稍減。現在回

想起來，使我感受到沒有適當的文字可以來形容。我記得幼年的衣食住，父母設法照顧得非常週到，不使我微弱的心靈上，產生絲毫不快或羨慕鄰家兒童的印象。

雖然我的父母這樣愛護我，但並不是溺愛和姑息。自從哥哥去世後，他們祇剩了我一個兒子，所以把一切的希望，都寄託在我身上。因此除費盡整個精力來愛護我之外，又小心督導。一舉一動，都含有教育的意義。

不說別的，自從我會走以後，我的母親有了空閒，從不同我到熱鬧的地方去，却常常引我到隔壁的孔子廟玩耍。大埔縣的孔子廟，除了收穫時有人晒穀外，平時很少人跡。年長時每去走一趟，即深感到牠的莊嚴偉大，神志爲之安閒。小時候常在那兒耍，不知不覺中一定會產生深刻的印象。而我的母親又把牠所知道關於聖賢豪傑的故事，講給我聽，勉勵我效法聖賢豪傑；並且常說做聖賢豪傑，並不是一樁難事，祇要好好讀書教品。這種環境，這種言論，不時灌輸到我腦筋裏。我毫無疑問地接受，覺得祇要好好讀書教品，並不難成爲聖賢豪傑。如是我的讀書教品的慾望，可說由此啓發了。

我還很清楚的記得一樁事情。有一次，我和鄰家的小孩子們在玩耍，我有一件東西，被他們弄壞了。我要他們賠，他們不答應，於是爭鬧起來。剛好我的母親來找我，我就哭奔到母親的懷裏，希望她幫我向鄰兒索賠。不料她抱了我大哭，說道：「阿澄，你這樣真使我傷心！我希望你要做聖賢豪傑，聖賢豪傑是這樣的嗎？你要是愛母親，就得聽母親的話，長大了讀書立志成人，不要因小小的事情，和別人爭鬧」。我大爲感動，從此以後，我非常謹慎，不敢再和小朋友們作無謂的爭執。

我的父母固然無時不鼓勵我讀書，但是還教我怎樣做人。因此洒掃應對進退的一切事情，樣樣指點

我做；過節過年祭祀喜慶等，都叫我去做應預備的事；甚至修理房屋，種菜飼畜，我也插在裏面。他們看見我勤勞，就是做錯了，並不加責備，隨時細心糾正。回想起來，必定有許多時候，反而添加了他們的麻煩，但因此我樣樣事情都能曉得。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我恰好用得着。

我見父親每逢有店裏的夥計或工人來收取賬款，父親無論如何忙碌，總丟開手邊的事，有錢的時候，當然立刻給他，如若沒有錢，也坦白地告訴他，並且約定什麼時候再來取，父親這種急切應付的態度，引起我的疑問。父親說：「夥計出門後，店主總希望他早些回去。假使過於遲緩，不但害他回去受責，甚至還有被辭去職務的危險。所以我總儘先應付他免他受累」。後來我才曉得這是惠而不費的方法。以後對於我處世為人受益不淺。

到了七歲的時候，記得我在家里，就常常有正式的職務，幫父母煮飯買菜了。因為家裏人手很少，每天早晨起床以後，照例是我的母親煮飯，父親出去買菜。如果母親有事外出，便由父親煮飯，我去買菜，如果父母都因事外出，那麼煮飯買菜的事，我就不得不包攬下來。有一天早上，我出去買豆腐，看見店門口擺了許多豆腐。我就問道：「你們的豆腐是不是沒有天亮就起來做的？」店夥答：「是的」。我道：「你們這樣勤勞，一定可賺很多錢了」。店夥又答：「我們能夠得個溫飽便是好事，那裏說得上賺很多錢」。於是我心裏生了一種感觸：世間有些人整日勞苦，做事非常努力，而結果只供個人自己的溫飽，甚至有的溫飽也不可得；有些人用力很少，而收效反大，不但個人生活安適，社會也蒙受其利，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我尋思了一會，恍然悟到我父母所告訴我的聖賢豪傑故事，了解這完全是由於有沒有受過好教育的原因。基於這個自我的警覺，我的讀書慾就更強了。

父母既然期望我做人，更誘導我喜歡讀書；而父親又常常勸母親說：『我年青時沒有好好讀書，所以一生辛苦。無論如何，總要使阿澄讀書，然後他才能夠向上做人』，那末我應該很早窮讀書了。然而鄰近的私塾，在我六歲的時候曾去過，都因為我家貧窮，恐怕無力繳納學費，不肯收容。父母又因為我年紀小，放心不下，不願意讓我獨自到較遠的私塾去。因此入學問題，直到七八歲，可以單獨往鄰家較遠的地方去，才獲得解決。

（註一）橄欖兩頭小中闊大，譬如每天祇吃一頓中飯，香杵兩頭大中闊小，譬如每天祇吃早晚兩頓。

二 一 私塾教育

我八歲啓蒙，先生姓饒名資泉。因為我很小時，就想讀書，但是到八歲才達到入塾的目的，所以不敢懈怠。雖然資質很鈍，却終日勤讀不輟。先生見我不偷懶，就是有時背不出書，也從寬責備。我並不因這種待遇，就存僥倖的心理，仍是戰戰兢兢，終年如一。甚至在睡覺時，也做夢讀書，尤其常常被背不出書的夢所驚醒。這種夢境，直到現在還常常發生，不過所讀的書，因時不同罷了。我在這家私塾繼續三年，讀完了四書，聽講了上論下論，讀講過少些古文時文和千家詩一部，並且能做短文。

十一歲時，我改進另一家私塾，塾師姓彭名祖佩。他教書很嚴，但是很喜歡我。在這個私塾，繼續讀了四年，因為教授法不同，祇讀完孟子、詩經、易經、禮記、唐詩、及試帖詩；至於古文時文，也隨班誦讀；八股文却能完篇，並已學做古文。

在這四年裏我所得到的最大益處，就是彭先生的教授法。他規定每天所講的書，第二天就要我們回講。在開始這種課程以前，他先叫我們提出不了解的地方問他。回講得不好，責罰是很嚴厲的。那時的同學，比我年歲大的也有，比我多讀書的也有，但是彭先生却指定各同學有不懂的地方先問我，我不能解釋時再問他。因此在先生未到之前，同學都一一問我，而我得到這種榮譽的職務，聽書特別用心。唯恐怕不能答復同學的疑問。這樣，無論在學識上和講話的技術上，都使我得到許多進步。

彭先生固然很嚴，而我父母的督導也無時或懈，尤其是我的母親，每天從私塾裏回來的時候，知道

我功課好，就非常喜歡；否則滿面憂容，並且說：「爸爸這樣辛苦，祇因為幼時沒有認真讀書，而現在願意吃苦，就是希望你讀書。怎樣你還可以不好好讀書嗎？」有時總把揮節下來的幾分錢，任何地方都不願化費，却買了糖果或其他東西來鼓勵我。

客家人不屈服於異族之下的精神，幼時是常聽見的；而父親還把太平天國經過的情形，詳細告訴我，並且說明洪楊的宗旨就是推翻異族的統治。有一次，塾師出了一個「魯仲連義不帝秦論」的課題，我的文章開宗明義就說：「秦，西戎之國也，異類之人也」。先生看過，吃了一驚，私下叫我去說道：「本朝皇帝是滿州人，你這種文章是可以與文字獄的，以後要謹慎些」。我聽了爲之悚然！

十四歲那年，我曾參加縣考。第一場時，我除做完自己的卷子外，還代人做了二卷，來湊貼考試的用費。第二場時，我首先交卷，縣知事適在座，見我年紀小而交卷早，便叫我上去，問我願意不願意多做一篇起講。我立刻答應。他出了一個「後生可畏」的題目，叫我就坐在他側旁的小座位上去做。我完篇後送給他，才見他懷疑的態度消滅，而頻頻點頭道：「的確後生可畏」。

可惜那年夏天，彭先生到江西去，我就停了學。未幾彭先生寫信給我的父親說：「……阿澄稟賦，雖不過敏，但極勤謹，異日必能成器，萬不可輟學。……」因此父親更注意我的讀書問題，過年後就叫我隨僮史庭允先生讀書。僮先生兼懂醫理；他知道我的家境貧窮，除了講授春秋、左傳、古文、時文、試帖詩等外，還教我和我的兒子及另外二位同學讀醫書。但是我讀了不久，因爲我的母親生病，跟着我自己也生病，功課落後了許多；爲了要補課，祇能終止學醫。在這時期中，我覺得左傳的論人論事和外交軍事，都寫得痛快無倫，所以非常喜歡；但是結果却沒有讀完。

那時，我自己覺得天資魯鈍，學業進步遲緩，而希望有所警悟，就改名曰「魯」，錢先生不明白我的意思，問我是不是以孔子自況。我儘量答道：「某何敢以孔子自況！因為天資魯鈍，從實取名，所以名魯」。先生喜道：「很好，「魯也魯」，「魯也魯」，我雖不是孔子，却期望你做魯參」。隨後，錢先生用海濱二字給我做別號，益見先生對我的厚望。

義和團事件發生在我十六歲的時候。當時在朝的人提倡，在野的人附和，報紙上整天發表打勝仗的消息，好像符咒刀真能壓倒鎗砲似的。縣署後面有許多松樹，松蔭下建了一座不盈方丈的伯公祠。這是人跡罕到的地方，我和三數同學，在那兒談古說今。錢和團是一個很感興趣的問題，並且多數以爲義和團會打敗聯軍的，而我獨執異議。及至義和團失敗，各同學來問我怎樣有這種先見之明？我說：「這運用是很淺顯的。張角張魯不能得志於戈矛時代，難道義和團會得志於鎗砲時代嗎？」因為那時同學們很喜歡看三國演義，所以引用了該書的事來答覆他。

那年秋天，發生了一件使我抱憾終天的事，就是母親久病之後，沒有得到好的調養，身體日漸衰弱，到了七月十四日下午，竟溘然長逝了！音容宛在，色笑長違，風本之悲，寧有終極！

家裏遭遇到這樣不幸的一件大事，家境更覺艱難困苦，這自不待言。但是父親對於我的讀書，並不因爲艱難困苦而有所疏忽。他爲了母親的喪事，負擔了一筆債；要維持家用，不得不增加額外的工。我很想幫助他，但是他阻止我道：「你的責任是讀書。每天做工所得，還多不過一百幾十文錢；我不願多這一兩幾十文錢，而妨礙你的學業」。於是我就對於學業，格外用心，格外努力。

我出世的破產，在八歲的時候，曾經由父親翻過牆；因爲費用不夠，借了一百餘元，不得不典出一

部份來還債，讓保留開做臥室。那年，我爲優於諸學識交起見，就向隔壁的本族試館，借了一間空房。這間房子雖小，但佈置得相當整潔。一般在談讀書和由鄉進城的朋友，不期然而然的時來聚談，竟成爲縣中不可多得的交誼知讎地方。

當年，我改進了一家大館，熟師姓張名竹士。他除補講大學中庸和左傳外，還講授周禮歷史及歷世之文。在這道科目中，我對於周禮，獲益最多，因爲除制度外，各家還有許多批評，可以明瞭歷朝政體。但是我却不可以此等科目爲滿足，另外自己用功，看完一部父親獎給我的編韻小字的通鑑易知錄，以及向朋友借來的資治通鑑和鳳州通鑑。我看通鑑易知錄時，一面圈點，一面做眉批；並且另外備一本紙條做短評，以補自己記憶力的不足。短評的標準，可分爲下列五項：（一）內中國而外夷狄；（二）民爲我，賊覆仇之，君爲輕；（三）對於人民，靡之，富之，教之；（四）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五）尊崇道德、學問、禮儀和節氣可敬的人事。有一晚，我正寫短評，張先生忽然進來了。我連忙起身，未及收拾紙條。他翻閱我所寫的紙條，說道：「這種批評法很對，並且簡單明瞭。你有這種史才史識，不妨多多努力」。對於讀史的方法，我本來沒有絕對的信心。自從張先生批評以後，我知道沒有走錯途徑，於是更精心圈點，註眉批，做短評，直到終卷爲止。嗣後那本通鑑易知錄和所做的短評，無論我到什麼地方，都隨身帶着；凡是兩省應慶有懷疑的地方。一查便知了線索。不幸辛亥革命的時候，因爲在我房子裏藏書被彈，炸毀慘淨，那本書和短評連同房子都燒了，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可惜。

我讀史時結果，得到一個讀史的方法。歷史雖浩如瀚海，却不過幾個朝代。那幾個朝代之中，最重關係的，不過是一個帝王或幾個帝王。這一個帝王或幾個帝王之中，最緊要的事情，也不過幾段，最重

要的物，也不過幾個。如果把這幾個朝代，幾個帝王，幾段事實，幾個人物，看得詳詳細細，其他的順次序瀏覽，那麼全部歷史就可以了然胸中。這樣一來，歷史雖繁，我却厭之以簡，由此即可類推以讀其他各種書籍。後來看到鄭板橋所譏的讀史記方法，正和我的意見相同。同時，歷代所發生之事實，是有因果，決不是偶然的。周末有春秋戰國之亂，所以秦朝廢封建改郡縣，唐末有藩鎮之禍，所以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因此武備不振，終宋之世，都受外患。史家最大的毛病，是成王敗寇。舉一個例子來講，秦始皇征民伏，築長城，歷史上罵得很厲害；實則長城保障中國幾千年，如果秦能一世二世而至萬世的話，那麼歷史家恐怕要說：「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了。我到四川灌縣，看見秦時所築的水壩，到廣西興安，看見秦時所築的秦渠，不禁大為感動，覺得由秦到現代幾千年，國民都受其水利；因成詩一首：「湘灘分派鑿渠功，人食秦皇惠不窮；堪比長城涵中國，詎贏歷史恐難公」。所以讀歷史，最要有遠大的眼光，從文字敘述之外，看出它的真象，才是對的。當時我有一句話說：「要從無字讀真書」，就是這個意思。

由於我自幼受家庭教育之長期感化，讀史更得了民族意識的觀念，以及時常聽見父老背誦太平天國軍隊經過大埔時所發的文告，民族意識特別認得清楚。及至中法中東諸役，清廷喪師割地，加以庚子聯軍以後，各國劃定勢力範圍形成瓜分局面；而清廷並無絲毫覺悟，政治每况愈下，還保持着一「宰贈友邦，毋昇家奴」的觀念；那班乳臭未乾的親貴都握着大權，為所欲為，人心鼎沸，時釀成推翻清廷的運動。那時潮流動盪中，國內發生了兩大派：一是總理領導的革命主張；另一是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保皇主張。前者鼓吹打倒內外失策的清廷，創立民國；後者鼓吹保皇，以立憲維新。我家隔鄰的崇聖

洞，設有書報社，所藏書報，除了保皇派的和歐美新時代的讀物外，也有鳳毛麟角幾篇革命派讀物。我常到那兒去看書，而我所好的，自然是革命的文章。至於保皇派的書報，在某一短促時期內梁啟超一派所發表的鼓吹革命的文章，我固然愛讀；就是他們反對革命的言論，我也喜歡看，因為從反對的文字裏，往往可以間接得到革命派的主義。我在這書報社裏所得的益處：第一是對世界政治思潮的認識，第二是對民族革命的認識。不過因為看書過多，加以版本不良，從那年起，我便近視了。

雖然我經歷過一次縣考，但是沒有參加過鄉試。大埔縣屬潮州。那年冬天，潮州舉行道試，張先生要我和幾位同學前往應試。抱着革命思想的我對於科舉當然是不會感覺到興趣的；不過想借這個機會去遊覽潮州，就結伴而往。攻試之期，照例須先買卷，我也隨着大家到學院去。學院的大門口，人山人海，把我擠住在那兒的石獅子旁邊。我張眼一看，不覺生了一種感想：這班人爲什麼這樣爭先恐後？無非是爲了功名。功名又是什麼東西？無非是帝王想英才盡入吾彀中的勾當。究竟功名值得幾文錢？於自己心身更有什麼裨益？於是大爲激憤，覺得我有真我，我的讀書是要爲着真我，不是供帝王玩弄。因此對於雜考試而博功名，就更沒有興趣，並認爲做學問，亦應另有路徑及開創。至於心身的修養，更是另有工夫。

年關已近，照例散館，各自回家，我也搬回試館。因爲快要過新年，就重將書房整理一番，塗了幾張字畫來懸掛。一天，張先生從鄉間來到試館，看見壁上許多我自己寫的字畫，便一一細看。他看到我懸掛橫額：「誰道有人和露寫？托根無地怨東風！」的句子，很不高興，說我年紀還輕，不應該說這種話。我謹告訴他，這是鄭所南先生的句子。他說：「若不是心有所賦，怎麼會這樣寫？」他又看到我

畫梅傳句子：「自有非常奇骨格，愈經霜雪愈精神」。問是不是我做的。我說：「是」。他稱爲數畫說：「幸有這種氣魄。雖不免顛沛，也還可望有成。否則，難免學生墮落無依了」。現在事過數十年，回首已往際遇，幾乎都逃不出張先生這幾句評語。

新年過後，有一天張先生進城料理書館，我在路上碰見他，就向他拜年。他問我預備在什麼地方讀書，我不禁感然回答道：「因爲家境日趨艱難。父親繼續學費不昂，我想做一年事，再繼續讀書，已經答應就某處的事了」。他聽了急切地說道：「你的前途很有希望，怎麼可以輟學！我免收你的學費，仍舊跟我讀書。我爲熱情所感，心裏頓覺興奮，我的父親更是喜歡。於是除繼續講讀上年那些書以外，還翻覽史記、漢書、老子、莊子、墨子、孫子及文選等書。到那年快要散學的時候，張先生對我說：「今年你讀書，上半年很有進步，下半年較差，什麼緣故呢？」原來吾鄉慣例，每逢時節，如端陽中秋等，照例學生要交學費。張先生雖然說明免費，但是父親還是竭力籌措，覺得對師長的禮儀是不該少的。我看見這樣情形，心裏實在難過，覺得我的自私心把父親害了。因此心緒不寧，影響到下半年的讀書。但是我並不說出來，祇託以他言。我受到許多少年繼續讀書的感荷，所以後來從事教育，總想使人無愧也可以讀書。雖未完全實現，但無時無地不散佈向這個目的去做。

連年冬，張先生再三勸我參加道試。原來我立意不想再去，但爲一面却不過張先生的盛意，另一面又被廣交奇人異士的念頭所引誘，也就再作湖州之遊。結果雖沒有交到奇人異士，却得到一個機會，在韓山書院裏讀書。那兒有幾個好處：可以廣充湖梅讀書人士；朋友當雜較多，可以借讀；並且考得好時，還有津貼。可是我進韓山書院後，因爲離家較遠，一時也得不到津貼，經濟上發生無限的困難，常

常一天三餐，祇有鹹蛋一個，或豆腐一塊，下飯。不消說起我父親征前所過的橄欖樹和香杵柴的生活，硬就處之泰然了。韓愈曰：「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不啻是我那時生活的寫真。

三 辦學與入黨

十九歲之初，我仍在韓山書院讀書。當時清季政治的腐化潮流，也波及書院。我們去冬進了書院，而院長直至本年二月才到。他出了幾個課題，祇有一個月的光景，又說要到別的地方去了。到了他要動身的那一天，我們全體借着拜見院長請示課程的名義，把他圍得水洩不週，迫他答應了不離開學院才散。那知到了晚上，他却偷偷地去了。我們的卷子始終沒有批下來，一般希望得獎金來做膏火的，都叫苦連天。而我還有一種失望，就是歷年所懷的革命思想，已經成熟到想實行的時期，但是覺得赤手空拳，決不會有所成就的。因此在書院裏，想物色幾個同志，然而處處留心，結果沒有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年夏天，大埔縣知事依據法令，也創辦學堂。我想新式學堂裏總可以得些科學知識，就遵照父親的意見回去應考。

這個學堂就是崇聖祠書報社的原址。招生規定正額二十名，備取六名。正額有住有食，考得滿還有獎金，畢業並有秀才的資格。我考了一個備取，祇有應試成績好時，可得獎金，其他權利是沒有的。

但是學校一開辦，就使我根本失望。因為學生年齡，由十六歲到三十歲不等，而課程則除算學英文外，一切都依舊節的方式，還是背書默書寫字。於是我時時流露出滿意的言論，甚至把這種意見寫在應課的文字上，同榜我的祇有一位同列備取的張燧。

有一次，課題是「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我會劉基「賣柑者言」的論調，大意說：「隆之大

雪，某甲作雪人，某乙見而笑曰：「用雪作人，頃刻融化。奈何以有用之精神，作無益之事，功安能成！」甲從容答道：「汝祇知其一，不知其二」。中間痛罵時局一頓，結尾說：「應時而興之學堂，今日背書，明日默寫；今日作文，明日寫字。將何以應現在科學進步之世界？此種作無益，害有益，其不能成功，與吾作雪人何異？」教師看了，大爲震怒，對我申斥道：「你說這學校不好，你有本事去辦一個好的給我看看」。我想這話却不錯；單單責人畢竟沒有什麼用處，還是自己辦一個學堂罷！那時意見相同的，祇有張煊，就和他商量；他非常贊成，於是我們二人到處提倡要辦學堂。

當時風氣未開，聽見我們兩個青年人要辦學，都認爲怪事；甚至有人對我父親說：「你的兒子本來很講厚，爲什麼現在變了洋鬼子」。父親告訴我這種批評，我便將現代潮流，細細和父親解釋。並且說明他國的強盛，主要的原因其學堂發達。因爲學堂愈發達，科學愈進步。結果船堅炮利，屢次使我國屈辱。這種堅船炮利，並不是可以拿八股策論來制服的；應當以其人之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該積極辦學堂，追上他國，才可以雪我國的恥辱，才可以使我國強盛。父親聽了以後，肯定地說道：「你努力去试试吧！」

不久，巧遇到一位姓彭的舊同學的哥哥，由江西回來，捐助四塊錢，做創設學校的開辦費。我大喜，對張煊說：「我們雖然有了四元開辦費，但是年紀輕輕，恐怕不易號召，最好請竹士先生出來主持」。張煊認爲很妥，立刻同去拜訪竹士先生。

他聽了我們一番詳細的陳述以後，很表同情，並且願意把張家祠大館的館址和學生，來做新學校的基本；同時還薦舉他的堂弟六士先生出來主持。六士先生是世家子弟，小有財產，而且學問很好。他不

但概允出來主持，還請饒錫蕃先生來幫忙。饒先生是一個兼通各種普通科學的人。除了他，清淨又阿來一位楊穆如先生，也自動參加。這樣，人力財力都有了。辦學就有聲有色起來。一般反對的人，看見這種情形，也不再肆意訾議了。於是我利用我的試館做籌備機關，所有辦學的人來到，父親盡一切的可能，極力爲我供給。

辦學既有頭緒，我們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聘定各科的教員。聽說水定一位姓盧的，剛由上海回來，算學地理都很有研究，我立刻就親自去請他來。其餘的也都由竹士六士兩位先生分別聘請到了。於是樂羣中學就在次年春開學，共有學生一百餘人，並且附設了一個小學，當時嶺東方面，共有四個中學，樂羣是其中之一。這是我辦學的初試；回想起來，成功竟是意外的。開學後六士先生到省城去購儀器書籍，實開大埔學校有儀器設備的先河；下半年還到南洋去籌款，預備另建校舍。自從樂羣辦了一年之後，第二年中，便有許多學生回到各鄉辦學，因此接連產生了二十幾個小學。同時我還創辦了三個，其中之一，直到今日，仍舊存在。

張煊在樂羣辦成後，回到家鄉去辦了一個樂育小學，並且請我去任教師。每年薪水五十元，衣食則由學生供給。我因家計困難，也就答應。這時我二十一歲了。那個小學共有學生數十人，年齡參差不齊，六七歲到十六七歲的都有，不得不勉強分成兩級。當時課程並沒有什麼標準，大都由教員依照着自己能夠教授的而訂定。我也不是例外，於是規定了國文、歷史、地理、數學、物理、體操等功課，而除了初級國文和習字由校中的另外一位老先生担任外，其餘都由我教授。那時又沒有現成的課本，不得不自己編纂。這種情形，現在看來，似乎很不合理；但是因爲環境關係，削足適履，事情是難免的。

當時我所編的課本，雖然自己覺得不滿意，但是學生的家長們看了，個個都說好，甚至到處替我宣揚。同時，在功課之外，教學生做各種工作，小如剪貼紙花，大則平地種菜，並且依照着他們的勤惰，各別給與分數，和操行學業同樣看待。這種辦法，不但學生們願意，家長們也很歡迎。因此種種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到學校裏來參觀；竹士先生也親自來過一次。他看了之後，很滿意地對我說：『難道園小易治嗎？』隱隱含着比樂羣中學辦得還好的意思。到了冬天，我又為該鄉辦了一個義學，自己帶義務教書，鄉人更以喜歡。休學時我將要離開學校，學生個個都依依不捨，甚至有下淚者，我深為感動，寫了一篇告別文，留在校內。

次年，樂育小學加薪到一百元來請我。而大埔縣立小學新的主持人是丘少青先生，自從樂羣中學開辦後，覺得許多地方趕不上，就自動改辦，將以前的學生結束，另招了高級初級各一班，要我去主持初級班，甚至福建有一個學校，也拿了半俸三百元的聘書來請我。但是我覺得再教書下去，就難脫離這個圈子，而消滅向上求學的意思。因此我商請父親，辭去一切聘書，讓我到省城裏去讀書。這樣固然要多挨幾年苦，可是學問方面一定有進益。父親滿口答應，於是我就立刻就籌備赴省讀書的事情。

樂育教書這年是值得紀念的，這不但是我教書的第一年，也是我獻身革命的開始時期。是年清明節後，有一位樂羣中學的舊同事楊穆如先生赴南洋吉隆坡加入了當時目為革命四大寇之一的尤烈先生所組織的中箱堂。他把這件事寫信回來告訴我，並且介紹我參加。以前我到處想找革命同志的心願，現在却居然實現了，不禁欣慰之至！我立刻答復他，並且表示非常之願意參加。這樣，我和南洋方面，就常常通訊，得到許多關於革命的祕密消息。

可是我雖然加入了尤烈先生所組織的革命團體，但是對於尤烈先生，却始終沒有見面的機會。直到民國二十四年，尤烈先生在廣州做七十大慶時，有人向我簽名發起。他看見我的名字，對人說：「鄒先生很早就參加我們的活動」。他八秩開一的榮壽徵文啓裏，有一段這樣說：「各埠同志，多有設同等之演講會，而最有名者，則爲吉隆坡之中和堂。同志陳文褒君（即陳文褒同志，黃花園烈士之一）由潮州來，帶有同志鄒魯君一信，內附七絕詩四首，其第四首末句云：『南洋早樹國民旗』。蓋該堂門首櫺聯，豎有青天白日旗，亦由是而知其影響之及於內外者漸廣也」。這詩我已忘記；而此老猶能寫出，記憶力堪佩。

七月間，總理由歐洲回到日本東京，組織中國同盟會，我的朋友張煊和郭公接恰好這時往日本讀書，遂行加入，於是他們常常把那邊的消息，寫信告訴我，使我知本黨主義，除民族民權外，還有民生；三民主義外，更有五權憲法。此外我還有兩個樂羣中學的朋友，分赴廣州汕頭讀書，和革命黨人都發生了關係。因此間接地我和他們也有了來往。所以這個時候，我雖然住在鄉村，却和國內外各方面的革命運動，可說已息息相通了。

四 廣州讀書與初次革命失敗

我求學的志願傳出之後，各個師友都表示贊成。他們知道我的家境貧窮，都願意幫助。有的資助一二元，有的資助三五元不等；最多的是我的星五族叔，他一見我說：「你到省城去讀書，每年我送你五十元」。我的父親又把房子加典十餘元，這樣總共有了一百二十餘元。這種熱情，固然使我興奮，但是還不免有些躊躇。因為這個總數，恐怕不夠在省一年的費用，饒公任先生曉得我的困難，安慰我道：「不必多慮，錢不夠時，有我接濟」，於是我才放心，和公任及其他五個同學，前赴廣州。那時我二十二歲。

自我赴省以後，大埔人出外讀書的，一天天多起來了。因為看到我這樣貧窮的，都能夠出外讀書，其他的自然更不怕了；加以我們到廣州後，所攻的學堂都入選，因此怕到了省城不敢學堂的觀念，也煙消雲散。

從韓江赴廣州，汕頭是必經之路。當我們到汕頭的時候，便有黨人來會面，待我如老黨員，表示熱烈的歡迎。到廣州時的情形也相同。從前只有通訊關係的許多同志，都一見如故，並且還時常聚集一堂，討論種種問題，友愛之情，不可言喻。

我的原意是投考師範學校，不料到了廣州，却沒有師範學校可考，後來聽說澳門有人創辦師範學校，我就約了十幾個朋友，束裝前往。到後一看，不禁大失所望。原來辦得糟透了。不但學生的程度參差不齊，其年齡自幼稚生到通儒院的都有；而圖書和儀器的設備，則空空如也。我本着率直的勇氣，提

按着已往的辦學經驗，貢獻他們許多意見。但是他們不接受反而說我多事，於是我和同去的朋友都掃興而折回廣州。

那時學堂初興，師才不足，師範學堂又少，而潮嘉人士到廣州的，大都想進師範學堂，結果弄得無校可入。又因為在澳門碰了一次壁，於是我就提議創辦師範學堂。

說來也許可笑，我是一個小縣裏生長的人，廣州是一個初遊的省城，人地生疏，毫無憑藉，竟倡議辦師範學堂，談何容易！但是我絕不氣餒。本着我滿腔的熱情和勇氣，認定了我的目標，到處奔走宣傳，暗求人幫忙。更拿我從家裏所帶來的錢，作為開辦費。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偌大一座廣州城裏，居然出現了一個潮嘉師範學堂。

在創辦過程中，也曾遇到不少困難。記得那時正當廣州鼠疫流行，死的人很多，大家都不敢出門。我被辦學的熱情所驅使，不顧一切，整天在外奔走；東接洽，西交際，忙得個「不亦樂乎」。有一天，因為找尋校址，曾跑到一所住宅，接連打門也沒有人答應。我推門進去，忽然看見地上橫躺着幾個死屍，知道是染鼠疫病死的。雖然趕快退出來，但已吃驚不小。

剛在創辦潮嘉師範時，提學便署辦了一個晚間上課的理化研究所。除了署內各職員和各校教員補習外，尚有空額六名，招人投考。我和公任都考取了。於是日間幹創辦學校的事，晚上去研究理化。接着廣東創辦法政學堂，招集官紳入學，除官員外，由每縣保送二名，大埔的是六十七先生和蕭劍盧先生，又除每縣保送者外，還有餘額招考，我和公任又都考取了。凡是投考法政的，都要有利銜的資格。我沒有辦法，就去捐了一個監生。我對捐務局裏的人說，如考取了，我領出十元的捐費；如不取，我出二元，按執監

變轉極難。後來我入學之後，同學們常常開玩笑，以為我的名字極難。聽着這輩人，却不知我的資格，還是十塊錢換來的監生。本來我想進師範，但是沒有適合我程度的師範學堂，因此祇好入法政。這樣日間也要上課，在勢不能兼顧潮嘉師範的事情，轉請了一位姓張的老先生來主持。

入學不久，看到黃晦閣先生所著的兩本書：一本是「廣東鄉土歷史」，一本是「廣東鄉土地理」。裏面竟有客家和福佬都非漢族的言論，我認爲他抹煞史實，有傷同胞感情，便挺身而出作文辯斥，同時請客家和福佬的智識份子注意。結果所有客家和福佬主持的勸學所，都一致附從，竟得到了全省的大半數。於是共同推舉我領銜交涉，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直到把那錯誤的言論修正了才能。經過了這次交涉，不但客家福佬的智識份子和廣府人都對我感情很好，就是黃晦閣先生本人也對我沒有絲毫芥蒂，反和我十分要好。關於這個交涉的文字，現在雖一無所存，但近年我有一篇演說，可以看出我當時證明客家和福佬是漢族的大概。（註一）

那時鄉前輩丘倉海先生，（名逢甲）適到廣州，我就去拜訪他。丘先生於甲午之役，因台灣割給日本，激於義憤，便領臺台人，組織台灣共和政府，武裝抵抗。失敗後，歷盡艱苦，才輾轉回到廣州。我仰慕他的爲人，因即投刺求見。他和我談了一會，忽然問道：「你是世家子弟嗎？」我答：「不是」。他又問：「你是富家子弟嗎？」我答：「也不是」。他再問：「那末你有富貴的親戚嗎？」我答：「也『好』」。他低頭喃喃自說道：「貧寒子弟，那會有這樣汪洋浩大的氣度呢？」接着拾起頭對我說道：「你從此就算是我的學生吧」。坐談半小時，竟得了一位老師；而以後於做事多所提攜，革命多所。人生得人識拔，真是一樁不容易的事；而我於偶然中得之，一方面當然感激丘先生的知遇，另一

方面更強了我的努力。

自從四塊錢辦成了樂羣中學，一百多塊錢創立了潮嘉師範，我真覺得世上並無難事；而拿破崙所說他的字典裏沒有一「難」字，的確不是誇言，祇要認定目標，埋頭苦幹，沒有不成功的道理。但是我並不敢自驕，不過膽量確比以前較大，志氣比以前較高。有一次，丘先生叫我和他的秋與八首，我回絕句云：「英雄心血人間事，芒屨當年豈有雲！」丘先生看了矍然道：「此「彼可取而代之」之氣，須善藏之」。我也由此更加檢點了。

潮嘉師範成立之後，接管更正了客福非漢族的誤解，不特我交遊日廣，而且屏州的黨人對我也更加親切，公推為同盟會的主盟人。同時許多朋友知道我家境困難，讀書費用發生問題，都紛紛解囊補助；甚至一面不相識的南洋華僑胡子春胡竹園兩先生，也給我援手。於是我得以安心讀書，並且有餘資從事革命活動。

這時我往來理化研究所和法政學堂上課，而革命工作又不容就擱，使我有些喘不過氣來。但是我認定：革命是救國救民的神聖工作，不容我們用任何理由來推諉；而從事革命，要有學問，要有主張，所以不能不讀書。革命和讀書既有密切的關係，便沒有捨此就彼的可能。我的補救辦法，祇是格外珍惜時間，使兩者可以同時並進。但是晚間上課的理化研究班，却因此中輟了。

當時法政學堂的教員，有幾位是日本人，其餘却是留日回國的。其中加入革命黨的不少，可是實際上始終參加革命運動的，教員中祇有朱執信先生，同學中祇有陳炯明是同志。因此我二人暗中往來甚密。

我的革命工作是宣傳和聯絡並重；宣傳的對象注重智識份子；聯絡的對象注重軍隊，企圖把滿清政

府的精兵，化爲革命的武力。查那時駐在憲城裏的清軍，分新軍和防營兩部份。新軍駐在城郊附近的營壘，裏面有趙聲同志任標統，下級幹部多屬小東莞陸軍速成學堂出身，對革命多表同情；還有新招的學生營，都相當有革命精神的智識青年。所以新軍方面，革命情緒頗爲濃厚。我常常利用傍晚課餘的時間，步行十餘里到新軍營去宣傳和聯絡。當天晚上趕不回來，就秘密住在營裏，第二天清早再回學校。每逢星期或假期，便預先約定聚會的地方，絕不放棄一個機會。至於防營，則分駐於廣東各地，官兵多屬會黨份子，而下級幹部中許多是虎門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當時會黨有一位首領，名叫譚馥，係同志。他在防營裏組織了保亞會，用以團結士兵。我結識了譚同志，更去聯絡士兵。該營長官中如曾傳鈺、何秉鈞同志等，都跟我聯成一氣。所以防營的革命空氣，益爲高漲。

民國紀元前四年，即清光緒三十四年黃興（克強）先生發動欽廉之役，黃明堂先生發動雲南河口之役，都告失敗，實深惋惜！十月，清帝載湉和太后那拉相繼而死，清廷失去了維繫社會的重心，人心浮動，確是難得的機會。但該時事出倉卒，同志多不在省，我就和趙聲（伯先）、朱執信、姚碧樓諸先生等，集於豪賢街朱先生家，密商起義計劃。當時作爲起義可能的力量有三：新軍防營和民軍。商議結果；新軍因趙聲先生以革命黨嫌疑去職，不能即時指揮發動；民軍散處四鄉，集合不易，且實力不足，不能做起義的中心；祇有防營的幾營人，正駐在城內觀音山及附近，發動較便。於是決議推我領導防營，首先發難，并推姚碧樓先生協助我。這個防營是我平時和譚馥同志往來聯絡的。預計發難後由朱執信先生集合民軍，趙聲先生策動新軍響應。遂設立總機關於清源巷，由我主持；另設分機關八處：（一）花塔街六榕寺；（二）光塔街清真寺；（三）西瓜園十四號；（四）城內興隆坊六號；（五）馬鞍街姚家

祠；(六)師古巷古家祠；(七)府學東街廖家祠；(八)香山觀音廟。經費方面，除趙先生朱先生各交來五百元外，其餘都由我籌挪。助我最力的就是姚碧樓先生。

定議之初，我便去和譚復同志商量。他滿口答應，但是要求我發會票(註二)，以便攔召。因為歷來發票往往失事，我不願答應。他繼續說：『若能多與時日，不發票也好』。我想：發票有洩漏消息的危險，不發票則遷延時日。假使過久了，社哲人心安定，那就要錯過發動的機會。想來想去，還是答應他發票，但切實叮囑他嚴密進行。料不到這次起議計劃，果因發票走漏消息，而歸於失敗。

發難日期，原定十一月二十日以前。那知十四日晚間，同志嚴國豐持票返燕塘營內散發，被人檢獲。因此嚴同志被捕，經過嚴刑毒打，供出了會票條譚復同志所發，以及他的住址，那時譚同志住師古巷古家祠分機關，清吏星夜派溫帶雄率兵往緝。溫係同志，將到古家祠時，他有意相救，命令隨帶的兵士說：『革命黨可怕得很。我們不能照從前捕匪的前後包抄法，而須合力向前門攻入，才可成功』。士兵奉命後，都由前門擁入。我派去助譚同志的葛謙同志，首先被捕。譚同志夢中驚醒，由後門逃出，直跑到總機關報告。清兵看見了，便跟着追捕，但是到清源巷時，沒有看清他究竟進了那座房子。那時在總機關的，既有我和張燦同志兩人，聽了他的報告以後，知道清兵一定跟踪而來的。向窗外一望，果見巷內人影憧憧。於是把秘密文件，盡付一炬，並且代譚同志改裝，大家同時作出走的準備。當時存在總機關的，祇有二十元，我就拿十元給譚同志，五元給張同志，自己留下五元。分別的時候，譚同志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革命失敗，責任完全在我個人，假使大家都能脫險，那末萬幸；假使你脫而我不能，萬事由我一人担着，決不會招出任何人，萬一大家都不幸被捕，那末你千萬留着有用之身，不要和

我爭死」。說罷大家分頭逃走。記得那夜陰雲密布，細雨霏霏。溫同志故意領着士兵向流水井搜查，我們却飛跑轉入龍藏街。清兵回頭來追時，我們已分別走開了。

我逃回法政學堂，在操場內躲了一夜。次日假裝無事，照常上課，以便探聽消息，料理善後。到了晚上，知道觀音山龍王廟裏捕去了曾傳範同志；十六日捕去羅樹蒼錢召榮兩同志，接着黎尊同志又被捕。並且聽說機關多被破壞；而文件是否全部被毀，又沒有確實消息。我和姚碧樓先生不得不赴香港暫避，並將經過情形報告胡漢民先生。

對於被捕諸人，雖經李準親到詢訊，但是個個都不肯說出實情。葛謙同志供詞千餘言，却没有一句涉及布置的情形。再三研訊，他說：「我的宗旨只是如此。我的同黨，我斷不供。我已拚一死，願快死為樂。我一人流血，留他們做大事業。歷觀歐洲大革命，斷無不流血而成者。近來因革命流血者，亦不止我一人。我的宗旨，雖死不能變。言盡於此，請速殺為愈」。李準因葛同志年祇二十餘，文學又好，很想成全他。於是對他說：「生汝何以自處？」葛同志答：「革命耳」。這種精神，實足永垂不朽。同時李準舉行防營大搜查，想澈底追究，不料營中有票者，佔十之七八，大驚，不敢嚴辦。既於二十三日，鎗斃葛兩同志，並且判決羅黎兩同志在省監禁，會同志解回原籍監禁，就敷衍了案。那時我二十四歲，初次領略到因革命失敗而死亡的經驗。不久，我就回到廣州，照常上課。但是姚碧樓先生，奔走此次義舉最力，竟積勞成疾而死。至於羅會黎三同志，直到民國成立才出獄。

翌年，譚震同志在湖南都督府被捕，解回廣州審問。我深信他不會供出任何不利於我的話，所以照常上課。但是朱執信古湘芹兩先生認為應該防備萬一，堅決勸我暫避，替我請了假，於是我祇得又離開廣

州。因此那年第三學年的學期考試，我沒有參加。譚同志被刑訊，堅不供人，朱先生看見這種情形，才放心叫我回來，剛好趕上畢業考試。而譚同志前後共被刑訊八十餘次，態度如一，到庚戌新軍將起義時，譚同志卒被害。

(註)吾粵有三種方言：(一)廣州話，(二)福佬語，(三)客家話。因方言之不同，粵人遂成爲廣府人、福佬人、客家三系。世人以此三系之言語，與中原不同，有誤爲非漢族者。其實今日之粵人，均非土著民族，皆來自中原者。祇因南遷時期有先後，所處環境有不同，所以形成三種方言。現試述其理由。廣府人係秦漢時遷謫來粵，因來粵最早，故能選擇珠江兩岸交通便利及土地肥沃之地爲定居之所。此等區域，原爲土著民族聚居麕集之處，故兩族接觸之機會最多，爲時亦最久，是以其言語遂有重大的變化，腔調聲音與中原語言迥然不同。所以認定其爲中原民族者，以腔調雖變，而其中原音韻仍然不變。欲知其音韻不變，最好以諍韻證之。今任覓詩韻中之一韻，若知其廣州音之韻中一字，即可推而知其他各字之廣州音，以七陽八庚等韻爲最明顯。故胡漢民先生嘗謂：「教學廣州話，最簡便之方法，卽從詩韻入手」。據此理由，故吾人可以斷定，廣州話實多爲中原音韻，而廣府人來自北方之中原民族實無可疑。至福佬之來粵，則後於廣府人。考其歷史，則在唐黃巢亂時，開始南遷。此南遷之福佬人，原爲河南軍隊之一支，其領袖爲王潮。當至福建，土人畏其強悍，稱之爲「河佬」，卽河南佬之意。其後有一部又由福建繼續南下，而至廣東。廣州人以其來自福建，稱之爲「福佬」，卽福建佬之意。福佬人來在廣州人之後，水陸交匯而肥沃之地，已爲

廣府人居住，故擇沿海一帶肥饒之地：如福州、廈門、汕頭、中山、雷州、瓊州等處居住。福佬人之言語，不單腔調聲音俱變，卽音韻亦變，遂有誤爲完全與中原民族有異者。殊不知兩佬人南來，原爲軍隊，來時有男無女，與廣州人遷謫而來能帶家屬者不同。每到一處，卽與當地土人女子結婚，其所生子女，由母撫育，於是言語亦隨其母，因此腔調聲音與音韻一齊變者，卽爲此故。惟其中語言，仍有不少中原古音，則因兒女受其父語言之影響所致，同時福佬話不僅與中原語言不同，卽福州話、廈門話、汕頭話、中山話、雷州話、瓊州話，亦各有異。此蓋由於福佬人隨所居之地與當地土人結婚，故其子女所學成之語言，亦因之而不同。此種說法，余遊古巴時，獲一有力證據。卽古巴華僑所生之子女，所說者均爲黑種人話。蓋華僑隻身去古巴，每祇能與當地黑人結婚，其所生子女，因歸母撫育，遂從其母學成黑人話。但偶或摻雜廣州話，卽由於接受其父之語言所致。殆與福佬人之語言受環境影響，完全相符。由此證明，福佬話音韻雖變，仍確爲中原民族也。查中華民族血統，北方多混於邊境民族，南方多混於土著民族，福佬人其獨著者耳。至於客家人，來粵最晚，大抵宋末雜護宋室南遷，故其始祖均爲南宋時人。其來粵分兩路：一、自江西，一、自福建。因其後來，廣府人福佬人稱其爲客人。客爲對土而言，卽外來人之意。同時，水陸交匯而肥沃之地，已爲廣府人居住，沿海一帶肥沃之地，亦爲福佬人居住，故只能窘居於山丘地帶。此外，客家入山居，更有政治原因，卽自宋亡之後，元朝欲追索隨宋南下之客人，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因防元人搜索之故，男子不敢外出。耕作買賣，不得不用女子替代。其家中雜

竟抱女等尋，反由男子主持。一代如是，歷代相沿，所以客家女子，無不耕種及從事其他勞動工作。於是客家女子，一因長途遷徙，二因習於勞作，均爲大足。相傳當日宋帝昺爲元兵所追，正溯江而行，而元兵至，舟子及隨從大駭，均棄宋帝昺而逃。正危急間，適有客家樵婦一隊經過其處，均肩荷竹桿，手提鐮刀，突然而出。元兵疑爲救兵，驟然退去。宋帝昺如是得救，大喜，卽指舟上各物，爲封贈客人婦女之用，並准客家婦女死後，一律稱爲「樵人」。客家之風俗，與宋元時之政治，其關係如此。至客家人語言，因其來粵較晚，與土著接觸機會最少，故聲韻與中原無異。所不同者，因在南方居住與中原語言接觸者少，遂變其首尾腔調而已。基上論述，可知廣東之廣府人，福佬人，客家人均是中原民族，因南遷時間不同而異其稱謂，並不同其方言。世之誤以粵人爲非漢族者，闕此明矣。

(註二)會票等於黨員的證章。

五 民意機關服務

二十五歲那年夏天，我畢業於法政學堂。畢業的時候，校中當局發下一張表格，叫畢業生填履歷及志願。在志願一項，各人都寫得很多：不是說畢業後希望任行政官或司法官；就是說辦自治或做律師，甚至有人把所有可能的事業都寫在上面。我想騙人決不可，照實寫我要革命又不妥，便祇寫了「難言也」。收卷的教員看了不滿意，拿回來叫我重寫。我躊躇一下，寫了以下數字：「如必欲言，則教育實業固所注意者也」。各教員看了，皆爲之發笑。

考試完畢那天，我剛回到寓所休息，忽然有人敲門，起來一看，是粵商自治會派人送聘書來，請我去做教員。

粵商自治會係粵漢鐵路股東們聯合所有廣東大商家而組織的，最初目的在反抗清廷以籌款收贖國有。後來每遇內政外交問題，時時開會，批評政府，極得社會好評。該會設在面圍華英寺，內開一禮堂，可以容納數百人，平時便作爲課堂。那兒有教員數人，員生則爲各商店的經理和店員；因此聽講學生人數不定，忙的時候人少，閒的時候人多。我認爲藉此可以接近民衆，就接受了聘書。

在粵商自治會教了半年，碰頭諮議局成立。我師丘倉海先生當選爲副議長；書記長是黃湘岸先生，下面共有四個書記，丘先生叫我擔任書記。因爲副議長是我的老師，對我很信任，書記長是個同志，對我很好；所以辦事很順手，精神很愉快。

那年冬，倪映典先生在廣州策動新軍起義，趙聲和朱執信先生等都親自襄助。我被推赴潮州頭，

運動當地民軍響應。諮議局在開會後就很空閒。粵商自治會也放了年假，我就借着年關回鄉省親的名義，請假前往潮汕。我不到潮汕，已經很久，一切感覺着生疏。經過了許多困難，才弄出個頭緒。忽然聽到廣州新軍的革命義舉，因為發難時間過於匆促，又歸失敗了。

我立刻回廣州，直赴粵商自治會，激勵他們用該會的名義，從事辦理營救新軍的工作。因為我和會裏的人，平時聯絡得很好，他們不但滿口答應，還熱心協助。這樣，失敗的黨人得到救援的不少。

後來廣東巡道王某，查出參與這次起義有關的名單，裏面在諮議局做事的，有我和陳燭明兩人。他帶了名單，謁見丘倉海先生，並且想拿捕我們。丘先生把名單一看，不待他開口便說道：「陳某鄒某是我最信任的。假使他們是革命黨，那末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單捉人的話，請先從我捉起」。王某聽了，強笑說道：「這不過是他們報告的名單。陳某鄒某既然是個好人，想必是他們誤報的」。這樣我們才能夠平安無事。

不久，廣西成立了督練公所，派了一個陳的道員到廣州來請幕友，很堅決地要請我和陳燭明去。但是丘先生不允；講來講去，祇答應一個人。我題和陳商量，覺得我們兩人中有一個到廣西去聯絡革命黨，也是好事；並且決定我去。於是我把各事料理妥貼，買舟溯江西上。不料到梧州以上一個叫「倒水」的地方，竟翻了船，行李全部損失，不得不退回廣州。

當我預備重整行裝再赴廣西的時候，黨人某等在北京刺攝政王未成被捕，公推我入京營救，並且叫我在那兒繼續策劃暗殺的事情。因為吾黨義舉，前仆後繼，死人甚多；於是保皇黨份子故意譏言中傷，說革命黨首領祇驅使無聊的黨徒於死地，而自己却逍遙海外，住洋房，吃大菜。黨人聽了，都怒

不可遏：某想沈刷這種侮竊，就約黃復生等入京，炸清攝政王載灃。事洩，同時被捕下獄的有黃復生羅世勛（偉章）等三人消息傳來，全黨震動，紛紛設法營救。胡漢民先生更派人到南洋去籌款，趕回香港設立機關，專門從事營救和繼續暗殺的工作。大家推我先去，佈置一切，以便各人繼續北上，我在法政學堂畢業，得了副貢和直隸州州判的名義，正好借此上京銓敘，使人毫不疑心。便向粵商自治會和諮議局請假；同時寫信回縣，約郭公接同志到上海會面，再寫信到盛京，約張煊同志到北京會面。當我到了上海，因為等候郭同志便借看看博覽會的機會，趁空到南京和黨人聯絡。接洽妥當後，再折回上海，那知忽然害了一場大病，預定的計劃不得不改變。因此郭同志到了上海，就請他先行北上。接着葉夏聲先生由浙江來，看見我病重，短期內沒有北上的可能，便送我回粵。幸而張煊同志接到我的信，便趕赴北京，會同郭同志探明了汪黃羅囚禁的所在地，並且設法和他們通訊。後來因為總理謀在廣州再行舉義，不讓我北上；就是已去的也被招了回來。

我病好以後，仍舊一面在粵商自治會教書，一面在諮議局做事。諮議局開辦的時候就闢了一間圖書室，在我的臥室隔壁。局裏議員們開會才來，開完會就走，無論在會前會後會中，都很少在圖書室看書，而其餘同事們，都有家眷，每天辦公後，個個回家，也很少在圖書室停留；因此這間圖書室，好像是爲了我一個人而創辦的。除了在粵商自治會教書和爲革命奔走外，我一天到晚都在圖書室裏。那個圖書室的規模雖然不大，但是各科新時代的書籍，却都有一兩本，所以種種智識，我都得些基礎，而二十四史及通志會典等，亦在這時瀏覽。

當時廣東的賭風很甚，倡禁之議，時有所聞。丘倉海先生和陳繼明是激烈主張禁止的；於是在諮議

局某次大會時，就由陳炯明等提出了禁賭案。

議員裏面有一個性靈的，係賭商，非常關練，因此大霧號叫他蔡大關。他很想使這個提案通過，對他有很大的不利。於是任大會將要閉幕以前，利用金錢，收買議員，並且天天打聽。結果不少議員，利令智昏，受了他的收買。這種情形，丘先生是知道的，並且認定這案很有被否決的可能。但是爲了要明瞭那一個個人贊成那一個人的起見，當大會表決該案的那天，他叫陳炯明陳炯明請一請本會關係重大，所以表決的方式，應該比平時的重，主張用記名表決法來代替慣例的建立表決法。凡贊成的，在票面上寫個自己的名字和「可」字；反對的寫個自己的名字和「否」字。蘇某等才明瞭陳炯明用意，竟讓陳炯明所提的表決法成立了。而禁賭案如丘先生所料的，却被否決。

投票時，由我登記。完事後，議長向我索閱票子。我說：「全部票子，我已一一登記，開列清單；這一部份是可票，這一部份是可否票。如若議長要把全部票子拿去，請先在單上簽字」。他沒有想到這着，就不敢要了。散會後，蘇大關又大儲其客。我對古湘芹先生說：「這個諮議局名爲『民意』機關，實際是『狗仔』議場，實在不願意再幹下去，我決意辭職」。古先生說：「是的，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如若你辭職，我也跟着你辭職」。當晚我把議場的情形，全部「可」「否」票的名單，赤裸裸地送到報館發表；同時呈辭職。有一位同事，係丘先生的親信，看見我這種舉動，大爲驚駭，怕出亂子，就報告丘先生。丘先生對他說：「海濱這樣做是很對的」。跟着古先生也提出辭呈。議長雖然極力挽留，我們却不願而去。既而丘先生和全部投「可」票的議員，都提出辭職，事變變成嚴重。社會人士擁護公論，在明倫堂開大會，聲援禁賭。這樣，投「否」票的議員，迫於情勢，也就不辭職了。

這一幕辭職聲，引起了清廷派出按察使鞠業道和巡警這三位大員來查辦。他們請我和方先生吃飯，藉以詢問此事的經過真相。席間我們除了陳述該事的始末外，並且很注意的講堂大員的言論和動聽。祇覺得他們虛有其表，而無其實。昏庸糊塗，可代表他們的一切。假使革命的對象是他們，那末是很容易應付的了。對於此案，清廷迄於清議，對我「否」票的議員，都准予辭職，而對我「可」票的，則都予挽留。我們和古先生更仍回原職。社會輿論對於這種事情，都表示好評，並且說我的供獻是大的。甚至廣州民間唱本的水魚書和船上賣藥的演說，都認為我是個議員，力主這次辭職的。這真是不虞之譽。

後來丘先 兼任兩廣方言學堂之督，要我去任教師，担任講授國際公法、經濟、財政等科，每週十多小時。於是這時我一身兼三職，而方言學堂的功課還要自己編講義所以忙得不可開交。幸而方言學堂分為十一班，每班的教材相同，因此編一次講義可以在各班通用。這省了很多時間。此後我每月所得薪水，加上了粵商自治會議局等，共有二百多元，使我除寄匯家用外，能夠有充份的餘款作為奔走革命和接濟同志之用。那時舉辦一事，或助人款項，少則一二元，至多亦不過十元；所以我的收入，足夠應付了。因為丘先生喜歡革命黨人，我又介紹朱執信先生來共事。到了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將要發難時，我和朱先生事涉甚多。衆之下報又將要開辦，勢難兼顧亦先恐遲累到丘先生，就相繼辭職了。

六 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民國紀元前二年，總理由檀香山經日本到南洋，召集黃興（克強）趙聲胡漢民（麗堂）孫眉及南洋各先生在庇能開會，預備再集全力，在廣州起義，但爲當地政府所不容。總理遂赴歐美籌款，將起義的專交託黃趙胡諸先生等主持。於是他們陸續回到香港，設立統籌部。

我聽見這個消息。正要前往，恰好黃趙兩先生囑人來約我。我乘星期六下午沒有功課，就趁船於當晚到了香港。翌晨，趕到跑馬地欄關，黃趙兩先生均在，相見甚歡。黃先生詳細說明這次起義的計劃以後，就對我說：『現在有一件急於緊辦的事情，特地請你來商量，不知你肯答應去做否？』我答：『祇要我有這能力，那有不樂於從命的事』。黃先生說：『我們想在廣州辦一間報館，做這次起義的宣傳。但是革命工作，暗中活動易，公開從事難；尤其在敵人的勢力範圍下，更爲困難。我們以爲主持的人，必須有相當的地位，並且要和當地人士有幾分好感，才容易着手，我想來想去，認爲你是最適宜』。趙先生也說：『此事已經與黃先生攷慮很久，除了你很難有適當的人』。我答：『既然兩位先生都以爲我能夠勝任，我就遵命』。黃先生說：『但是部裏沒有辦報的款項，要你自己設法籌劃』。我答：『我回去後當盡力設法』。同時他們告訴我：『這次辦報是個別負責。假使你沒有他事，就可回去，不必再見別人』。

當晚我回省城後，仍舊到方言學堂等處上課辦公。我對於這件事，認定先須有籌款的路徑，並且要有掩護，才能減少阻力。於是和陳炯明商量，決定經費在諮議局內部籌集，以避免妨礙起義的捐募。至於

報名則定爲「可報」；係利用那時諮議局禁賭案投「可」票的「可」字意義。這樣，人家會當作這報是諮議局辦的，可以增加號召力；也可借諮議局的招牌，來做我們的護符。計議既定，就舉行集款，很得到議員們的幫助，在短短的時間內，就集成相當的數目。不過我因籌款問題，却破了一次戒。許多諮議局的議員們喜歡吃花酒，常常約我和陳炯明參加，但是每次都被我們婉言謝絕。當籌款可報經費的時候，有一位議員願意捐一間舖面做館址；可是有意開玩笑，要我們兩人請他吃一次花酒，才能夠答應。我和陳炯明沒有辦法，祇能敷衍了一次。

我的可報，既有經費，又有館址，過了新年，就罷辦。至於主要的編輯，廣州有朱執信、馬育航、葉夏聲、陳達生、凌子雲諸先生，香港天天也有稿件寄來，但都用化名，不知究竟是誰。可報雖然出版，但是經費短絀，常常缺這樣，缺那樣，都要我設法彌補。文章不夠，更須自己動筆，最感到苦的是看大版，須要挨夜，因爲我一向有早眠習慣的緣故。

可報宣傳的對象，比較着重軍人，目的在爭取清廷的武裝隊伍。因此評論和消息，與軍人有關的居多。每天出版後，派人送到新軍營和巡防營；名義上對軍人半價，實則免費贈送。軍隊裏以及社會上突然革命空氣很濃厚。這種情形，被清吏察覺，但是因爲冒着諮議局主辦的名義，還不便來干涉。後來革命風聲緊張，可報的言論也更加激烈。碰巧溫生才同志在諮議局前面，刺死了廣州將軍孚琦。當時我在局裏聽見鎗聲，還以爲是守衛弄鎗走火，就叫當差出去察看。那句守門的警察跑來報告，孚琦被刺。我聽了非常驚奇，就走出去看。到了議場邊，見一個二十左右的青年，向我跪着叫救命，並說他是將軍的兒子；我也不顧，直到轎邊，見孚琦的脚伸在外面，知道已經打死。孚琦的護衛兵役，看見我站

在講述，才慢慢的集合前來，我就把這件事，詳詳細細說在可報。後來溫生才同志，就在乎琦的稿的點正法。我又親自去看，見身首異處，碧血晶瑩，同時圍觀的人很多。我大為感憤，又在可報上把種種情形，儘量披露，並且連續做了幾篇文章，對於溫生才同志，加以贊嘆，清吏忍無可忍，可勒令停版。茲將巡警道停版令照錄於下，可見可報宣傳情形的一般：

「爲嚴肅事，檢閱該報本月十二日雜著一欄，謂爲東門外之牛書觀，言云：『溫生才乎！你何愚不可及，乃至此多難發生之地，犧牲一生，作地獄壁上之紀念物？曾、左、胡、李何曾不是英雄；乃必步曾史、徐後塵，濺血東門，始爲英雄乎？』等語。夫溫生才，不過聖賢之一夫耳。以無意識之舉動，而蹈大逆之罪名。致之於古，則春秋之義，亂賊爲人之所必誅，信之於今，則暗殺之擾亂治安，不得儕於國事犯之列。生則既無足稱，身死亦不足惜。尙而英雄之可言。乃竟以曾、左、胡、李相况，無屬擬於不倫；卽史、徐一流，似亦不可同日而語，甚至比爲寧武子之愚不可及，尤爲紊亂邪正，顛倒是非。又十七日雜著，謂溫生才之短槍抬高身份，竟云：『其行事非常流所逮』。末二段又云：『嗟天！天地昏晦，怨毒充盈，短槍之聲，劈空而起。』宗其語氣，一若晦冥否塞中，賴有轟烈之舉動也者。末又云：『嗚呼！大陸沈沈，戾氣過於六合，不聞日雲之隙，珠江之涓，竟有溫生才之人，與其人之短槍。』於溫生才一名以存，而短槍亦借其人以其垂不朽。』似此兇人兇器，該報長言之不足，而詠嘆之，表章揄揚，不遺餘力。是何居心？又同日新聞記載，行刺將軍之犯正法有云：『記者遊東門，見各軍過者，無不向之聚觀，觀者大有憑吊歎飲之概，甚至有流涕者。記者佇立河觀此情形，亦爲之惘然』。爲不思該犯身伏國法，死有餘辜，何至如死徘徊

易水，憑吊夷門，竟足令過客歎歎，遂大感泣，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輩人必不出此。乃該記者，自言對此情形，爲之憫惻，豈傷心，別有懷抱嗎？抑氣類相感，獨表同情乎？由前之說，不啻重疊翼於千鈞，由後之說，直欲指鷓鴣爲鸞鳳，真所謂大惑不解也。又查本月十六日國聞感言欄內論袁國賊內，有「究其原因，則由禹世一系，永承其神聖尊嚴，不可侵犯之天，而皇帝先不自愛國始，宰贈友鄰，異家奴之言，固流傳人口，不絕於耳。」等語。夫此等言論，豈臣、賊之言？其贈友不贈奴之言，固有何來，而據爲典？該報口不擇言，一至於此，律、德、政宮庭之罪，其何辭？即使一檢，偶觸忌諱，而該報遂倡不交國之說，並以聳動民憤激思慮之心，而食亂黨之口實。其貽禍不可勝言，非僅險險分歧，宗旨不純正者比。核與近日所載溫生才新聞雜著，鼓吹暗殺主義，推波助瀾，無所不至，爲擾亂之尤。本道於言論機關，極力維持，藉以開通民智，原不忍過於吹求。惟念實在屏衛治安，深恐片紙風傳，一倡百和。際茲事變之後，合官廳與各社，均維持之不足，祇一二人破壞而有餘。恐券言之亂政，禁邪說之惑人，法所不容，情非得已，亟宜查照報律，永遠停版，以示懲儆。除諭令該報停版，并飭由西四區遵照申報外，合就諭飭，諭到該公會，即便轉知各報，一體遵照毋違！此諭」。

這篇堂議皇議的文章，可說爲可報寫真。

可驟被令停版後，因爲同業們向來對我們的感情很好，並且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就自動地好意地用報界公會名義，請求巡警道准許復刊。巡警道迫於不斷的要求，表示可以通融，只是要我寫悔過書。我因爲發難期間很近，事情非常之忙，並且覺得實傳到這田地，再進一六也無益話語，就拒絕寫悔過

警。同業不明底蘊，以爲我過於固執；等到革命爆發以後，才恍然大悟。

這次我所主持的機關：一是「可報」，除出版外，並連絡一般普通黨人；一是諮議局，除藏軍火炸彈外，並接洽主要的黨人。起義的種種工作，大都籌備妥貼，我的職務本來是辯可報，沒有當選鋒的責任。可是我見起義在即，便自動參加。到了三月二十九日，我預約先在嘉應會館齊集，再與姚雨平先生去發動新軍。那知因去始平書院拿軍火，延阻過久，及抵城外，黃克強先生等已在城內發難。驟然全城內外都宣佈戒嚴，斷絕往來。這時我既不能前往嘉應會館，也無法退入城內助戰，而在西關方面，因為沒有軍隊，所以戒嚴比較鬆懈，祇好繞道到可報館。一路聽見槍聲不絕，又看見總督衙門起火，熱血沸騰，切望這次義舉一蹴即成。不料等到半夜，逐漸靜寂，革命竟又失敗，惜哉！但是影響所及，全國震動，清吏胆寒；因此武漢義旗一舉，各省景從，不百日而革命告成。

失敗後第二天，清早起來，我便向東一直走去，看見沿途杳無人影，而到處騎着屍體，心頭不禁悲憤悽愴。不久回到諮議局，同事們都搶上來問消息。因為我要安置軍火炸藥，必須先使他們離開；所以故意告訴他們，這兒是用武之地，最好立刻躲避。他們果然聽我的勸告；我又吩咐警兵差役等，到外面去看守。這樣，我將全部軍火炸彈，妥爲密藏；並且把有關文件燒了。事後我若無其事，仍舊住在局裏。不離開的原因，就是想繼續救護同志。過了幾天，丘先生由鄉間趕到省城。次晨找到了我，立刻說：「你和競存（陳炯明的號）參與這次起義的證據，已被清吏搜獲。競存已走，你也應該立即避開爲要！」於是我便決定出奔。在走之前，死難的同志已葬在黃花園。我就買了許多黃花，叫工人種在諮議局的四周空地；然後向同事們辭行。他們問我什麼時候再回來，我慢慢答道：「所種黃花開時再會」。

(註一)果然是黃花盛開的時節，廣州光復成功了，都督府設於諮議局，我也回到那兒見都督胡漢民先生。這可說我的預言兌現了。

(註二)各烈士葬黃花岡後我作黃花岡長歌共數百言以寄哀。適同志有以詠黃花岡詩見捕者，友人將余稿焚去。今祇記末段云「……黃花岡！黃花岡！岡上黃花岡下魄，精靈相通竟脈脈。欲求遺魂已無蹤，祇有黃花可尋跡。認將黃花作鬼魂，世間一切原假借……。」

七 光復廣東與北伐

三月二十九日革命之後，我由廣州到香港，住文咸街泰記。這個泰記，是南莊莊口兼做客棧，店主是張敬先生，雖不是黨人，但極同情革命，所以我們能夠記他的店舖來做革命機關。他的掌櫃，是余子青同志，我一切的信件，都由他代發，如有黨人來見，也由他傳話，所以那間泰記，居然成了我做革命的總機關。此外，另設分機關於處。雖然義舉失敗，但是仍積極準備，以待再起。那時主要的工作有：（一）徵求黨員。在籌備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時候，陸軍小學學生應徵數目的衆多，已經引起我的注意。到了這時，他們更踴躍起來。有一次，數十學生結伴由黃埔乘船到香港文咸街泰記來加盟，可見當時的風氣。（二）籌募款項。因為準備軍事，巨款難辦，曾派郭公揚同志，到南洋去籌款。不幸在吉隆坡，他被汽車輾死，引我失了個得方的幫手。（三）謀設密更。當時陳炯明和我商量，想組織暗殺機關，謀刺李準；我籌得了五百元給做經費。於是陳炯明約了廖敬岳，在香港鴨寮街設立機關，研究製造炸彈，我有時也參加。不久，陳炯明在廣州和林冠慈，實行炸李準。雖然結果祇傷了李準的脚，但是後來廣州光復，廣東浙漢大員中之第一樞密李準，這的確是一炸之功。

民國紀元前一年八月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晚上，粵漢黨人在武昌城樹起義旗，中華民國即由是而誕生了。

武漢起義的消息一傳，各省軍志均趨響應。廣東黨人，聚集香港，急切商定定難計劃，以謀光復廣東。決定由朱執信胡漢民謝炳生，督廣州起義；陳炯明，徐維勤，姚雨平等負責計劃北京北甯三江和韓

江的起義，公推我駐香港，負責接濟各江義舉的人力和財力。九月四日鳳山被炸。九月十一日陳炯明在東江發難，正和清軍相持不下，派人來請援兵，我剛剛組織了兩三百人，買到了兩百支鎗，並且租定一隻輪船，預備開到汕頭去。因為東江告急，便立許先犯人和鎗都撥給那方面，並即派人趕去報告。夾惠州的同志得着援兵即到的消息，勇氣百倍，就把惠州城佔領了；而事實上因鎗支不能按期交到，他們那時尙未得到接濟。接着附省及省外各屬，都紛紛起義，卒於九月十九日，精吏逃走，正式光復廣東，推舉胡漢民先生爲都督。

這時我在香港的任務完成，便預備回廣州，動身的那天，一位女同志買了燙髮機，就把我的辮子剪掉；我感謝之餘，拿我所藏的袍褂和辮髮送給她。各人都取笑我，說爲什麼這兩件寶貝，一直保留到現在。我笑說：『我活動革命辟得此二物，庇護不少呢！』

廣東光復成功之後，革命軍佔領的區域，已超過中國全部之半；於是各省公推代表到武漢，共謀對內對外的一切事宜。廣東所推的代表中有丘倉海先生。他原任廣東教育部長，因爲要參加會議，很希望我能夠接他的職位，當時大家也勸我担任，胡漢民先生催促尤力。但我想在清廷未倒之前，那有心思做官，就堅決謝絕，並推薦葉舉先生來替代我。葉先生就職後，和我商量應收的教育方針。我因革命不知何時成功，急需要輸革命精神於青年同時需要多數青年效命疆場，所以主張學生軍訓。葉先生答應採納，可惜在職不久就離了職。

同時廣東正預備召集省議會。我參與省議會組織法起草。在討論章則的時候，我力主張面加一條，規定女子爲省議員的名額，其理由一是男女平等二是女子在革命運動中也出力不少。後來廣東省議會

裏，居然有女議員，創立了我國的女子參政的先聲。

但是清廷未倒，三民主義未實行，我們的責任也當然未完成。於是我和姚雨平先生及一般同志，進行組織北伐軍。這次光復，大都由清軍反正；起義的又泰半是民軍；一般革命同志，不願和這些隊伍混合，因此就有了這個組織。胡漢民先生也非常贊成，並且撥最好的鎗炮給北伐軍，而款項也特別充裕。組成後，姚雨平先生任總司令，我任兵站總監。

兵站總監的委令，係胡漢民先生的手筆，駢四儷六，洋洋數百言；真是咬唾珠璣，朗朗上誦。此外有副監二人，一是曾仲宜，一是吳雨倉（後改名倚滄）。那時一起工作的人，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且十之九是沒有在機關或社會上任過職的。其來源：（一）陸軍小學學生，如蕭冠英，何春帆，廖志人，范其務，郭冠杰，溫泰華，張倫，范葆初等；（二）留日學生，如鄒卓然，鄒芷芳，彭壽生，何季威，何卓麟等；（三）兩廣高等方言學堂學生，如楊實其，蔡秋農，鄒毅然等；（四）華僑同志，如鄒敏初，楊穆如，廖公先等；（五）舊同事與同志，如彭蔭香，涂演凡，郭冠雄，溫明卿，黃五梅，劉祥芝等。當時一般同志十分起勁；但是有人却取笑說：『你們在總監下面做事，不是監子，就是監犯子。他們聽了這話，就不高興，要求更改名義。我祇好答應，就同胡漢民先生商量，先生說：『你要用什麼名義就什麼，決定後來一個報告便是了』。結果改名為經滙局，該局成立之後，又發生了職位問題。因為這班同事，從前在一起活動革命，根本沒有地位高低的觀念；如若分起來，反覺得不便。於是除會吳兩位年紀較大，資歷較長者外，都叫局員。而他們向來抱着有大家做的態度；所以實際上不但沒有什麼困難，而且彼此融洽合作。你兄我弟，如家人一般。甚至袁飯端從，都是這些同事來做。因

而想起小說上瓦崗寨梁山泊的情形，却十分相像；又聯想到叔孫道起朝儀，漢高祖歎爲「今而後知帝皇之尊」，可見當時同打河山的人，大家一定是很平等的。到了起朝儀之後，才有高下之分。祇因未見史傳，才忽略了這種事實；恐怕歷來民間鬧起的帝王都有這種情形。

十一月我統率局員和北伐軍一小部份，先坐了專輪北上。那時在一起工作的女同志，聽見我們北伐，也組織了女子炸彈隊有一部隨同出發。我的床下堆滿了炸彈，這是革命黨人向來愛惜炸彈很普通的事，却忘了牠的危險及令退思，應該發笑。到了上海，都督陳其美（英士）先生熱烈招待我。因爲在廣東革命時，有一位朝鮮志士金凡齋，和我們在一起秘密工作。他是陳先生的好朋友，平時已經把關於我的一切，對陳先生說過；而陳先生的爲人，他也詳詳細細地告訴過我，因此我和陳先生神交已久，無怪一見如故。上海兵站事 承陳先生的幫助，使我毫不費力就辦妥了。

上海兵站事務辦理就緒，並派定了曾仲宣主持繼續購買軍火服裝及馬匹後，我便統率職員及一部份軍隊入南京。進城的時候我騎着馬，看見沿街掛滿國旗市民頻頻向我拍手歡呼，心裏覺得興奮，但是又有些奇怪。後來知道黃興（克強）先生原定那天入京就副元帥代理大元帥職，臨時因事中止。剛好我帶兵進城，市民把我當作黃先生了。他們都交頭接耳地說：「爲什麼大元帥這樣年輕呢？」

我到了南京不久，總理由歐洲返國。當時十七省代表選舉 總理爲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總理在南京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職；組織臨時政府，改元中華民國元年，採用陽歷。推翻帝制的素願，完全實現，並且得躬與其盛，內心快慰，自不待言！那時我二十七歲。

雖然民國成立，但是袁世凱仍挾清帝，負隅北方。臨時政府命令各軍前進；廣東北伐軍則由津浦跨北

上，攻打鄂陽。我的總機關設在下關，分機關除上海時以外其他的設在軍隊的所在地，並且在江北各地，設立機關，購米以及採辦雜糧。這些機構，都由黨員主持。他們派了出去，因為要對付，就命他用分局局長的名義；回來後仍做局員，却毫無前尊後卑的觀念，而處之泰然。那時江北荒年，買米很不容易，交通又不甚便利軍隊更覺複雜，因為同志個個努力，又有吳南倉來往各處，分別督導，結果十分完滿。民衆亦特別得到好感無論總局或分局的事，都由各同志親自辦理，並沒有增添其他附屬的員役。同時我和全體同志同事約定，在清廷未倒以前，我們每月祇領薪水五十元。至今我仍可爲全部人員担保，無一個有絲毫弊端。

當時北伐軍總司令部設在城口。自姚雨平先生統兵過江後，總司令部復由我兼理。每天我來往兩處，都用馬代步。兩部份的事尚無貽誤回到南京時有個山東同志陳幹，本來不相識，突然投刺請見，並且對我說：「我能夠在江北組織軍隊響應，祇須給我名義和接濟。我看他很熱誠，又有能力，便給他五千塊錢，並且替他請求陸軍部長黃興先生給他一個淮軍總司令的名義，後來粵軍圍鎮時，和浙軍共同作戰；打南宿州時，就和淮軍共同作戰，直把張勳打敗，進佔徐州。清廷知無法挽救，乃急退位，因此淮軍的成立可說是個很重要的意外收穫。」（註一）

清帝退位，總司令把總統的職位，讓與袁世凱，以促成全國的統一。當時最好的現象，就是個個人心地純潔，大公無私，毫無利祿觀念；祇想共同努力建設一個良好的中國。因之讓賢讓能，却是常有的事；爭權奪利，毫無所聞。全國籠罩在新精神之下，可說前途無限光明。不料袁世凱做了總統就想做皇帝，竟利誘威迫破壞國民道德造成以後混亂的局面。這真是最可痛心的。

民國成立，北伐軍的任務完成，我就把局事結束，同時陳炯明電要我回去任財政廳長，我乃將青年同志，除已學成及原係留日讀書有官費者外，一律請總理由稽勳局派赴日本留學，計有廖志人，陳銘樞，何春帆，蕭冠英，張倫，郭冠杰，溫泰華，范其務，謝膺白等。新中國最急需的是建設，而我尤注意造就這方面的人才，因此這批留日生，大都學理工科。料理既妥，即返廣州，姚雨平先生於清帝退位後覺得當時的軍隊太多，質素太雜，和我們商量之後，決定提倡裁減。遂自動在南京解散北伐軍，為各軍做個榜樣；祇留下一營砲兵，調回廣州。從這樁事情看來，一方面可見革命同志，功成身退，毫無權利觀念，完全以國家福利為歸依；但是另一方面，因裁了革命的軍隊而減弱了革命的實力，這是其他黨員亦不太願意做官，使軍閥官僚繼續為害國家，至于餘年之久。足見這種謙讓舉動，是功是罪，却很難斷言的。

(註一)民國二十四年冬我赴南京出席本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舊地重遊，想到昔年在南京有三件故事，吟成以下三首憶辛亥的詩：

統帥入京（辛亥冬月余統廣東北伐軍前隊入南京城見沿街懸旗老幼拍手歡迎莫名其故後始知黃克強先生原定該日入城就副元帥代理大元帥職屆時不至而余為焉）

統帥當日入南京，老幼沿街拍手迎。都訝元戎怪年少，那知馬上早書生。

柳陰競馬（余原任兵站總監駐下關大軍渡江後兼理總司令部事日須入城視事傍晚騎馬出城極與各將領馳馬柳陰下）

數鞭齊舉馬爭馳，楊柳陰中夕照時。投筆未成纓未請，儒冠猶是舊丰姿。

大觀樓醉飲（固鎮南宿州連捷清廷退位班師回南京宴各將領及女子炸彈隊於下關大觀樓
全座皆醉討袁之役下關爲馮國璋所燒大觀樓付之一炬）

寒飆踏來宴侶憐，當年曾醉大觀樓。劫餘無復存灰燼，空對長風感逝流。

八 整頓金融與北上

剛在結束兵站事情妥貼的時候，廣東都督兼民政長陳炯明要我回去任廣東財政廳長職；並且知道我沒有錢，寄來一千元做旅費，我便離開南京到了上海。我是很喜歡遊山玩水的，有了機會決不願意錯過。就乘這個時候，到杭州去遊了幾天西湖；然後回廣州。那知我一到廣州，生了一場大病，歷時月餘才痊愈。在那個時期，總理辭了臨時大總統職，偕同胡漢民先生等回粵。於是陳炯明讓胡漢民先生任都督兼民政長，自任廣東經略。當時胡先生見我大病未愈，而財政廳長職未便久懸，遂委了廖仲凱先生。迫我病愈，胡先生要我任官銀錢局總辦；因為那時廣東紙幣發生擠兌風潮，使用價值祇票面五成，而官銀錢局無法開門。我覺得難做，但是胡先生却說非我不可。同時他還担保，祇要等到紙幣恢復原價，就讓我辭職。我無法推諉，祇能勉強答應了。

當時廣東的紙幣為什麼會這樣跌價呢？因為清末廣東紙幣，共發行數千萬元。這數目並不能算多。光復以後，財政當局恐怕清吏帶走了未發的紙幣，在外亂用，因此發了一個命令，所有紙幣，須送財政廳加蓋新印，始得流通行使。於是全省紙幣，集中廣州加以光復以後軍隊驟多，就引起了這個風潮。

接事後，按着實際情形，決定救濟辦法：（一）請省政府嚴令各縣征收機關，一律祇收紙幣，不准索取現洋。如是不獨各縣的紙幣，不會再集中在廣州；即以前由各縣來的紙幣，也會倒流回去。（二）由造幣廠加工鑄造現洋，同時秘密在城內外各處設立兌換錢莊，暗中每日提高紙幣價格若干成分，俟紙幣恢復十足時，即將錢莊結束，在局兌現。

這個辦法實行了以後，向裏一位老職員突然來請見我，說：「這個位置歷來是很好的。何況現在紙幣跌價，更是十載難得的機會。加以總辦的這個辦法實施了，紙幣價值就會逐日提高，直到恢復為止。總辦只須把今天所收的紙幣，明日才登記，所得的數目就可觀了。假使吸收低價值的紙幣，每天定數為十萬，只拿五萬報數也儘夠了。局裏的職員一半是總辦新用的，就是我們舊職員，那一個不希望這樣，使大家都不至於清苦呢！」我看了他的神氣，便猜到他的主意，不等他說完，就放下臉來對他說：「這是清廷舊官僚的辦法，清廷會亡，原因就在這點，你做了民國的官，還不知道草面洗心，真是太無天良了！這次我饒你，如若再發覺別的事，要一併嚴辦！」那位老職員連忙「是！是！」地走了。

經過了幾天，幣值漸漸高漲。我就招待新聞記者，把我的辦法向他們宣布，並且告訴他們原存的紙幣若干，市面流通的若干，鑄莊每天收若干，已封存的若干，以及鑄幣廠每天能鑄出銀幣若干，每天流通到外縣若干，預計將來廣州市面流通若干。詳細地告訴他們。避開了庫門，引導他們看封存的和現存的紙幣。再把每天出入的數目，都交給他們細查。他們非常滿意，就對我說：「你要我們怎樣幫忙，我們都很願意」。我簡單地答覆：「我不敢煩各位老同業為我這份宣傳，祇要老同業把實實在在的情形，發表出來就好了」。各人都很高興。於是報紙將實在情形宣佈，社會上產生許多好評。從此人心大定，不到一個月，就使幣值完全達到十足行使的總位。我就辭職。胡先生以約言在前不好再留我，祇要我另薦人繼任，我便擺脫了這職務。

我脫離了官銀錢局，適逢袁世凱電飭各省派代表入京，共商國家大計。廣東派了三個人，我是其中之一。北上以前，我先去看陳炯明。陳對我說：「這兒正在許多事要你幫忙，你怎能入京？」我笑對他

說：「第一、我爲你謀事；第二、我要見見中國的人才」。陳問我道：「你爲我謀什麼事？」我說：「庫倫獨立，你不要說出兵嗎？我去爲你促成如何？」陳說：「很好！很好！」

原來當時袁世凱對廣東，別有用心，企圖分化廣東的革命力量，想抬出陳炯明來倒胡漢民先生，造成潮鹽水火的局面。我到了北京，袁世凱知道我和陳炯明是同學同事，相處甚久，以爲我是陳派。因此除普通接見外，還特別約見了一次。他問我以陳代胡如何？我直說：「這事恐怕不妥。政府如有意重用陳炯明，現在解決庫倫獨立問題正亟，不妨派他去專辦這件事」。袁點頭道：「等我慢慢商量」。那時候袁的秘書長梁士詒也在座，袁即說：「以後請你多與燕孫（梁士詒的號）接頭，他的話就是我的話」。後來梁又再三提出以陳代胡的意思，我仍堅持着以前的態度。等到會期滿了，我便起程回粵。

到了廣州，陳炯明立刻來訪。我便告訴他：「我既和你謀事，不但沒有成功，反而你辭去了廣東都督和民政長」。接着遂將經過詳情說給他聽，並且對他說：「你和胡先生都是吾黨中堅，宜合不宜分，團結不僅是黨的福，也是國的福；所以廣東都督和民政長，你是千萬不能做的」。當時他的心裏，究竟覺得怎樣，我無從猜測，但是口頭上說：「你代我辭了都督和民政長，那是很對的」。當我在北京時，袁梁會特別招待我，遂引起許多無謂的懷疑和謠言。我又不好辯白，也不值得辯白，祇有畫之一笑說：「將來自有事實來證明」。

陳炯明去後，我隨即往訪胡漢民先生，詳細報告北上情形。他對於我未來的職務，提出了三個，叫我選擇：一是瓊崖鎮守使，一是潮梅澄饒區長，一是廣東審計處長，我表示都不願感。他問我要什麼？我說我要做國會議員。胡先生極同意，因爲這是中華民國第一屆正式國會，主任任是制定國家根本大

法，關係國運民生非常重要的。於是我就趕回潮州競選，結果當選了衆議院議員。雖然民國初年的選舉，說起來比較純潔，但是也不免有人出錢運動的。我固然沒有錢，根本亦不屑用這種卑鄙的方法。然當投票時，常聽見大呼：『我舉鄒魯』，以表示他具清高的樣子。這可見許多人選舉我，完全出於熱誠。

選舉完畢，正值年關，我便回家省親。那時我二十八歲。自從那次之後，一直到現在沒有再回去過。回首鄉關，爲之黯然！

當我未到家以前，有一個曾經在官場上混過的人對我的父親說：『這次令郎回家，必定帶來很多金銀』。父親問他什麼緣故。他說：『令郎北伐時任兵站總監，回粵後任官銀錢局總辦，這兩個都是肥缺』。父親說：『我想來決計沒有』。那位先生還說多少總是有的。等我回到家聲，方才知道我返粵的旅費，還是胡陳兩位送的。那位先生嘆道：『古人有言，「知子莫若父」，這句話真是不錯的』。

民國二年春，我回到廣州，即預備北上出席國會。

當時政論，都不滿意袁世凱用命令公佈那些未經過臨時參議院議決的官制官規。有的主張提出彈劾；有的主張國會移到南京開會。我爲了事實問題，還原諒他，以爲不必過事譴責。這一二年，我遍閱當世人物，覺得袁總算是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人，所以總理有以十年總統期許袁世凱的話。因此我主張，正式總統，當依照總理的原意，讓袁當選，但是對於內閣總理趙秉鈞，則必須要推倒。

同盟會自民元改稱爲國民黨後，總理任理事長。那時總理在日本，黃興唐紹儀宋教仁陳英士諸先生都在上海。我到了上海，常常和他們共同開會，討論本黨在國會裏應採取的政治方針。大體決定後，方

歸北上。

宋先生受總理命，到北京主持黨務。宋先生本來約我同行；但是我因為辛亥年所統率的廣東北伐軍，在固鎮和南宿州兩役陣亡的同志，都葬在南京莫愁湖畔，想前往憑吊。於是我先一日赴寧，約定第二日在浦口車站相會。

三月二十一日清晨，我在浦口車站等候宋先生，直到火車快要開的時候，國會議員招待員很倉皇地走來對我說：「宋先生昨天在滬寧車站遇刺，生死不明」。這像一個晴天霹靂，使我神昏昏久之。接着火車向北開駛，我心中的憂鬱，難於筆述。想到宋先生平日主張政黨內閣制最力，常說正式總統可以舉袁世凱，但是內閣必須由政黨組織；政府自不樂聞。這次國會選舉，本黨佔絕大優勢。宋先生由湖南至滬，依此主張，大事宣傳，尤觸政府的嫉忌。他的被刺，當然有政治意味，這是無可疑義的。但是政治競爭，不樹堂堂正正之旂，而用卑鄙齷齪的手段，這種惡例一開，中國政治，將至不可收拾了。

九 國會內的奮鬥

我當選了國會議員，離粵入京出席的時候，胡漢民先生祕密約我去談話。他說：『這次國會制憲法，選總統，競爭一定很熱烈。本黨要取得一切的勝利，仍有賴於各方的協助。凡是須要廣東協助的，你可便宜行事。至於本省所選出的議員，都是屬於本黨的，必須好好維持。這個責任，千萬請你担任』。我說：『責任是不敢辭的，我當時時請示』。胡先生說：『那就照這樣辦罷』。因此以後在上海和北京，凡是黨中的機要事，我都參與。

到了北京，我便租一座較進的房子做住所。名義上是用來做廣東議員的聚集所，標為公餘俱樂部；實際上遇着黨中有機要事件，常常在那兒商議。當時國民黨的中堅省份，係湘皖贛粵，所以北京中黨部的一切費用，就不能不靠這四省來負擔。不過湘皖兩省，因為本身收入較少，故負擔很少，大約一切費用之中贛省負一部份，其大部份則由粵省負擔。而粵省負擔的所有收支，都由我經手，我的責任也就更重。因此，便引起了袁世凱對我的注意。

不久，宋案兇犯應夔丞在滬捕獲，國會就在這風潮鼎沸中，於四月八日開會。國會中的議員，除國民黨外，尚有民主黨，統一黨，共和黨。但是三黨議員的總數，還不及國民黨的人數。分別說來，衆議院中國民黨議員佔半數以上，參議院中則佔十分之七。最初國民黨想和他黨攜手，以期實行自己的主張；不願意以多數壓迫少數，致傷感情。所以凡事都派人到院外商量妥當，然後在院內發表。但是這種

國民黨就暗中吃虧了。

袁世凱本來知道國民黨的可怕；而國會選法結果，國民黨又佔了絕大優勢，更爲擔憂。所以在國會開會之初，他就由清極而變威極來對付國民黨，竟有和國民黨不兩立的觀念。他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急切成立大借款，收買統一、民主、共和三黨的議員；並且餘錢與梁啟超湯化龍等，將三黨合併成爲進步黨。但是三黨合併起來，還不能超過國民黨的數目。於是就利用三黨出面，收買國民黨籍的議員，借以分散國民黨的力量。結果國民黨某議員得到某黨多少錢，而加入某黨的風傳，天天聽見；國民黨議員脫黨的啓事，也常在報端發現。可是脫黨的啓事，未免太明顯，爲了避免這點遇見，就想出一個更妙的方法，凡是投一票贊成一事，可得若干津貼；或不出席以減少反對的票數，也可得若干津貼。形形式式，無奇不有，然而袁對於上列辦法，還以爲不夠，未能爭得議員的多數，遂實施釜底抽薪的方法，用鉅款來運動國民黨議員自行離黨，他想出了以後，第一個便找到我。

剛到北京的時候，就有北伐軍的參謀劉某和淮軍司令原某兩人，常常到我的寓所，要我介紹或代問候廣東籍的議員，又表示願意介紹山東河北籍的議員，和我聯絡。我因以前本來相識，現在又這樣誠懇，曾經介紹他們認識廣東籍的議員，並且答應他們借用我的寓所歇宿。這樣頻頻往還，毫不在意。有一天，他們聯袂來訪，看見座中沒有旁人，忽然鄭重對我說：「總統很想借重先生，擬撥四十萬元，請先生組織新黨。這事總統命軍政執法處陸處長建章辦理，陸處長叫我來致意先生。」

因爲事出意外，當時有些莫明其妙，我便問他們：「難道爲了選總統，制憲法，要這樣做嗎？」他們都說：「是的！是的！」接着我說：「我身爲國會議員，係代表國民謀國民福而來的；所以一切

都以國利民福爲前題。希望轉告政府衞安諸公，千萬不可把國家的金錢，作爲個人權利爭奪的費用」。他們便默然而去。

過了幾天，陸建章派了專差送帖子來請我吃飯，更由劉陳二人來致懇勸，要我準時前往。我明白他的用意；但想入京以來，政府宴會，已屬司空見慣，却之不使，決定去敷衍一趟。席間，陸備道敬仰之誠，招待非常週到，却没有提到新黨的事，祇在送我出門的時候鄭重說：「我有事請劉陳兩位轉達先生，這是總統的意思，千萬請先生答應」。翌晨，劉陳兩人果然來訪，重提前議，我嚴厲地說：「一切的話，前次都已說完。政府的措施若是福國利民，即便不送錢給我組黨，我也當然竭力擁護；否則必聯合同人，積極反對」。他們也就沒趣地告辭去了。自從我拒絕組黨以後，歷時不久，什麼癸丑同志，超然社，政友會，相友會，潛社，軍益社等新黨，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但是政府看見廣東籍的議員特別多（因爲包括華僑），而又全是國民黨，知道我無法動搖，遂特別由廣東請來一位姓江的紳士，專做運動廣東籍議員的工作。

國民黨原想和各黨合作的，到了這時候，就完全發現不可能了。及至競半選舉兩院的議長問題，國民黨主張用記名投票法，目的在監督黨員；三黨主張用不記名投票法，目的在收買票權。各有用心，相持不下；每次開會，都有熱烈的辯論，甚至呼號漫罵。英國有句諺語：「國會係一羣狂狗亂吠的地方」。我由此完全相信了。

這樣爭辯了好幾天，參議院通過了記名法，於四月二十五日選出了國民黨員張繼先生爲議長，王正廷先生爲副議長。後來衆議院也選出了進步黨的湯化龍爲議長。

不料參議院選舉議長那天，宋案真相大白，證明是政府指使的。才晨又有政府違法的五國銀行四二千五百萬鎊大借款發生。於是全國大駭，紛紛反對；更有贛、粵、湘、皖、蘇、閩、浙三省聯合反抗袁世凱的風聲。這樣本黨的機關報便大審萬惡政府，暗被政府；而政府的機關報也捏造黃興反叛，李烈鈞反叛。

宋案本來是議員們到了北京後最主要的討論資料，幾乎無時無地無人不在此研究；並且各個都哀悼朱先生之死，而袁世凱也殷殷以致悼緝兇號召於全國。起先許多人認為與總統問題有關；我還從好的方面設想，以為政府縱然腐敗，總不至於用此暗殺手段。而政府要人，則強說國民黨內閣，發生了悲慘的結果。我痛斥這種謠言的無稽。不久捕獲兇犯武士英和廉慶丞。同時上海來的人答復我的信，都說有許多證據，證明和袁世凱與趙秉鈞有關，我對政府更為灰心。

為避免壓迫，明白與相計，許多人主張組織特別法庭，審訊宋案兇犯。結果仍交與江蘇都督程德全審問。他在參議院選舉議長的那天，宋案全部公佈。證實了暗殺朱先生，係由國務院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秉承着內閣總理趙秉鈞和袁世凱的命令指使應犯所為的。在應犯住所搜獲洪述祖的電報和信件裏，有「撥宋副動位」和「冬電到趙區即交兄面呈總統」等語。於是各省軍民長官和各團體，尤其是國民黨人，責難政府的電報，如雪片一般飛來。趙秉鈞曾遞電辯護，但愈辯愈糟。後來上海地方檢察廳稟傳趙秉鈞和國務院秘書程經世到案。趙等諸多藉口，抗不到案，還捏造黃興先生和宋案有關，提出訴訟詎黃興先生也該到案，及黃興先生到案，趙等仍不到案，我以他們藐視國法，破壞紀綱，立刻依據臨時約法第十九條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在國會寫提出質問（註一），並限三日內明白答復。

那知宋案公佈的次日，政府又醜然違法簽訂了五國銀行團二千五百萬鎊的借款。當大借款簽字前一天下午一時，我正在公餘俱樂部 and 幾位同事談宋案問題，忽見參議院正議長張繼先生副議長王正廷先生跑來說：「聽說政府祕密接洽大借款，就要簽字，大家想想，應該怎樣對付」。聽之愕然，都主張設法制止。但見時間迫促，召集會議已來不及，於是決定即請張王兩先生以議長資格往見袁。袁託故不見。簽字那天，袁派總統秘書梁士詒代表來見張王兩先生，說明借款的刻不容緩，竟完全是個遁辭。張王兩先生從梁的談話中，知道簽字地點是在匯豐銀行，時間就是那天晚上；遂請王先生向各銀行交涉，請停止簽字付款，却沒有得到結果。後來有一部分人在銀行的門口守候，政府人員却從後門回去了。

接着參議院開會要求政府出席報告，但祇得到一個書面答復，說該借款曾經臨時參議院通過。衆議院開會的時候，結果也是相同。我就和谷鍾秀依法指示，更提議定期五月五日請政府出席報告。那天政府派代理總理段祺瑞主席答復，他仍舊堅持曾經臨時參議院通過的理由。我和谷鍾秀、彭允彝、張耀曾、白逾桓等紛紛詰問，段詞窮，承認「手續不完」。衆議院通過一個議案，大意說：「借款並不反對。惟政府違法簽約，咨送本院查照辦理，本院決不承認，應將合同咨還政府」。散會後，袁黨責湯不該將該案付表決。湯羞甚，不得不假託已過一月的祖母喪請假。

當時進步黨正在組織中。兩院內形成了國民黨和進步黨兩大勢力，而對於大借款，相持不下，常有激烈的爭論，甚至相毆，還通電互相攻擊。後來開會，進步黨就用不出席的方法來抵制。同時政府及各省軍民長官團體等，對於宋案和借款，也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發出函電，兩不相讓。袁世凱明令裏竟有：「擾亂和，破壞國紀，甘冒天下之不韙，本大總統一日在任，即有捍衛疆土，保護人民之責，惟

有除暴安良，執法不貸」！而學督通電，亦有：「粵省兵尚充實，械亦精利，軍心團結，誰爲禍首，願覆共和，當與國民共棄之」！劍拔弩張，已有不逞收指之勢。我抱抱着依法解決的希望，曾和粵籍議員，通電反對內戰，以免搖動國基。結果產生了兩事維持會，由兩黨各推十八人組織，以第三者的資格，出來調停，協商解決。我是國民黨推舉的一人。以前我曾許多次被推舉担任種種職務，如憲法起草委員會等，却都辭了；因爲我覺得事情是該大家分來做，不當集中在幾個人身上。但是這次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沒有推辭，經過幾次的磋商，對於宋案，進步黨雖不記代政府辯護；但對於大借款，則認爲已成事實，反對無用，可監督他的用途，並主張改組內閣，以了結違法借款一案。國民黨贊同改組內閣，尤屬寬湯化龍出來組閣，但堅決主張政府將借約依法交議，這點進步黨始終不肯贊成，因爲國民黨在參議院佔絕對多數，恐遭否決；而對於組閣，因內部團結，尙不完善，也不敢担任。於是調停就沒有結果。

政府把借約咨送國會後，我便仔細研究，當晚草成了彈劾政府違法大借款案（註二），由本黨決定用衆議院全體黨員的議員連署，提出國會。政府辯護大借款的理由：第一是藉口曾經臨時參議院通過；第二是援引以前克立士卜和亂秦霖海兩借款，都於簽字後提請議院內案和追認的例子。這些都是欺人之言。於是我在彈劾案內，除痛駁政府這兩個理由，指明臨時參議院所通過的，並不是這個借款，而備案和追認，絕對沒有法律的根據之外，最後我說：「凡國家有要事發生，儘國會閉會時期，尙宜特別召集。況國會已開，增進人民負擔，至二千五百萬鎊之多，豈容不經議決，驟置簽字乎？」

報紙上發表了這篇彈劾案的全文，除透社因爲借款與各國有關，就根據着將全文拍電報到歐美去，民

立報又把全文拍電到上海發表，於是所謂袁氏違法、借款案，乃大白於天下。以前國人對於大借款的違法，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的彈劾案發表後，全國不但知道經過的詳情，還明瞭違法的真相。反對的函電，比以前更多。但袁仍執迷不悟。我向來抱着法律萬能的觀念，所以對於宋案，主張由司法解決，對於大借款案，主張由國會解決。到了現在，事實與理想完全相反，才曉得法律還沒有到有效的地步。正鬧得激烈的時候，政府想先和緩對外的問題，以更全力對內，就締結了關於蒙古的中俄條約，送交衆議院來討論。雖然我竭力反對，但卒被通過。爲謀補救起見，我就將不能贊成的兩點，提出質問，要求政府答復。原文如下：

中國在前清與各國多結有無條件特惠國待遇之條約，現中國與俄國結此條約，許俄國以種種權利，則各國援無條件最惠國待遇之條約相要求，自在意中。斯時中國如不允也，則各國豈肯放棄此既得之條約上權利，由俄國獨張權力，破壞均勢之局面？如其允也，則中國之權利有限，列強之慾望無窮，恐彈指即至之瓜分，不在兵戈，而在樽俎。政府將何以應付？此其一。

此次條約之結，原爲取消庫倫獨立。若庫倫獨立，不能取消，則政府當以武力取消之，此段代理總理出席本院時答覆議員質問之言也。夫中國政府允以和平辦法，及依照條約，保護俄人在蒙古之權利，載在條約第四條；而第五條復載俄國政府，允使外蒙古承認中國在該境內重行設立官署及派員駐紮有華僑各地之權。味第四條之意，所謂和平辦法者，係不許中國用武力於蒙古也。味第五條之意，祇規定其他中國向來在蒙古之權利，而不及軍隊者，是貫徹前項要求不派兵至蒙古之精神也。此次條約已結之後，庫倫不取消獨立，即我國能出武力，俄國根據此次第四第五條之規定，

其能許我國用武乎？夫未有此條約，政府固藉口防俄國干涉，不敢用武，不能用武；有此條約，則俄國之根據益實，我國之置詞益窮，尙能用武，尙敢用武乎？不能用武，不敢用武，則此約之結，徒許俄國以權利，而庫倫之獨立，依然如故，且恐因此而生出關於朝鮮之中日事件，則尤所痛心疾首。將來政府究用何種方法，可以担保確能取消庫倫獨立，而不生他變？此其二。

這種質問，政府自然祇以空言敷衍。而袁世凱又急於想達到目的，利用已得的大借款，來收買軍隊，收買議員，對付國民黨，還覺不夠。所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着又發生了一件違法的奧國三百五十萬鎊借款案。我立刻提出彈劾案；（註三）也由本黨全體衆議院的議員連署。這時誰都不能代食辯護，因此進步黨和其他新成立的兩黨也跟着提出彈劾案。我的彈劾案列舉政府失職七件事，違法四件事，結尾說：「夫國基初定，風雨搖飄，政府即守法奉公，力謀國利民福，猶恐千鈞一髮，任重難艱。矧使一己之私圖，置國家於度外；奉個人之意旨，視法律爲弁髦。值承平全盛之時，經每汲深，尙慮弗濟；處國步艱難之日，水深火熱，安望不危？嗟乎！莽乾坤容此濁流，蒼生何託？好山河等諸孤注，赤縣將沉！苟非急起更張，決難返亂爲治。用是臆陳政府失職違法之舉，舉大者，謹依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二項，提出彈劾，俾國務員全體一律罷職」。

這篇彈劾文，揭示了當時政體的一斑。雖然趙秉鈞和財政總長周學熙因爲此案通過了第一讀會就丟了職，但是袁世凱終於不顧一切，造成二次革命。

（註一）質問趙總理何以久不依法趙實審原文：

上海檢察廳長於本月六號附傳票一紙請北京地方檢察廳協助分期代傳關於宋案處嫌疑者之國務總理趙秉鈞秘書程經世，按期解達到廳。乃

隔旬日，不見趙總理等到葬。查臨時約法第五條：「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刑法第二條：「本律對於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犯罪者，不問何人適用之」。趙總理等爲中華民國人民，宋案發生又在中華民國國內。上海檢察廳既依法律稟傳趙總理等，趙總理等何以久不依法赴質？謹依臨時約法第十九條，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質問，暗於三日內明白答覆。

（註二）彈劾政府違法「借款案原文：臨時約法第十九條，參議院職權第四項：「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民國憲法未定以前，臨時參議院所定之職權，爲民國議會之職權」。是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國會未成立以前，其議決之權在參議院；國會成立以後，其議決之權在國會。國會於本年四月八日開會，凡有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在四月八日以後，當然由國會議決，始得發生効力。法律具在，萬不可違。乃政府與五國銀行團訂立二千五百萬鎊之借款，其內容利息五厘，實收額八四，担保品爲鹽務收入及海關盈餘；特殊條件則銀行團派人爲鹽務總稽核所會辦，及各稽核分所協理。凡此條約，未經國會議決，竟於四月二十六日進行簽字，顯違臨時約法第十九條，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在政府借口此案業經臨時參議表決，當然繼續有效。不知契約之結，首重主體。參議院祇認六國團借款，現爲五國團，主體不同，則前案當然不能繼續者一。六國團之借款，既公佈謝絕，美國又脫出六國團，則從前參議院所議政府與六國團借款權，業已中斷，現又從新另與五國團借款，則前案更當然不能繼續者二。前周總長報告六國團借款條

約，利息五厘五，（當時參議院未承認請周總長再行磋商低減），實收八九。現則利息雖爲五厘，實收祇得八四，條件變易，則前案不能繼續者三。況乎參議院議六國團借款案，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參議院秘書會周總長報告二十一條件，祇五條特別條件有條文，餘普通條件十六條僅有大義。當時院內將六國團借款特別條件五條，表決其大體，并未將全案逐條表決。亦以普通條件，當時尙無條文，奚自表決？故主席宣告，毋庸表決，衆贊成。此事錄具在，不可罔也。否則政府既未正式提議議決，又未經三讀會之過半數贊成，更無咨撥政府公文。安能憑周總長報告之條件，祇衆贊成無庸表決之大義，而謂議案通過乎？況當時聲明，此次表決特別條件，係與六國團商訂之標準；至商妥之後，仍須將全案提交參議院議決，始生效力。是當時六國團借款案，尙未正式通過。此次所訂借例，何從而得繼續有效乎？至於政府借口克立士卜借款簽字後，始提議參議院追認，及隨奏豫海借款，簽字後始正式咨照參議院備案先例，以爲違法之辯護。則政府用意，愈不可問。夫臨時約法參議院祇有議決公債之權，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之規定，并無事後追認之條文。今臨時政府冒天下之不韙，對於克立士卜及隨奏豫海借款，竟蹂躪約法。於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不先交前參議院議決，既已先蹈違法之罪，乃不自斂，反欲利用，竟乘國會之初開，借口先例，明目張膽，以蹂躪法律。前參議院於此二事，未據法方爭，僅於克立士卜案內，聲明永不爲例，失職既甚。今國會再不爲法律保護，將使政府無時不可開先例，以蹂躪法律。是中華民國之法律，不爲政府摧殘無所不止。尤有進者，凡國家有要事發生，值國會閉會時期，尙宜特別召

集。况當國會既開，增進人民負擔至二千五百萬鎊之借款，豈容不待議決，驟擅簽字乎？爲此依法提出政府違法借款彈劾案，即希公決。

〔註三〕彈劾國務員全體失職違法案原文：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國紀蕩然，民生凋敝，強鄰日逼，衆怨沸騰，誰爲厲階？均由政府失人釀茲危局。自國務總理趙秉鈞組織內閣以後，失職違法，尤足令人寒心，整理財政爲國家生命之源。趙內閣組織經年，迄未開財政上有何計劃，惟日以借款爲不二法門。小借款案層出不窮，其彰彰較著者，如倍克立公司一千萬金鎊及海關鐵路之借款，用途率多曖昧。甚至六厘公債不依法募集，任意將債票折扣抵押，浮冒開支，重人民之負擔而不恤，陷國家於破產而罔覺。此其失職者一。民圖外交，寄着失敗，尤以關於蒙古之外交爲甚。雖曰國勢不振，有以使然，而政府失機，實加促敗。蓋庫倫獨立，業經年餘，政府既鎮撫之無力，甚至玩愒因循，不與俄國嚴行交涉，至釀成元年之俄蒙協約。猶復空言搪塞，不肯實力維持。蒙古尙可增兵，吾國未加守備，反至調兵南下；貽俄人以乘間進行，使外交益無轉圜，生出此次中俄條約之結果。且所駐蒙古之兵，譁變搶掠，全無節制，更足以使蒙人生心，外交失敗。此失職者二。光復以後，軍隊如林，政府既無統一之力，復無整理之方。日言裁兵，而信陽保定正定一帶，又復紛紛增募；政府用心，莫可究詰。今全國尙存八十餘師，而軍紀頹廢，器械雜錯，切實可用者，寥寥無幾。卒至蒙古舉發，進攻不能，退守不可；倉皇失措，甘受外人挾持。所謂軍政者何在？其失職者三。國家亂實，所以任事。乃國務總理趙秉鈞財政總長周學熙等請假輒至數月，教育總長龔缺，竟至

數月不補，內閣開員，動行整理。其視國事如兒戲，有如此者！計所職掌之事，一年以來，發育不興，實業不振，行政亦萎靡而不能進行。各部之計劃，有成績者，究無一見。祇見官吏如鯽，坐食誤公。各部之事，尙未能整理，遑言整理各省。此其失職者四。若其違法之事，尤更難數。茲舉其犖犖大者：臨時約法第三十三條，臨時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但須提交參議院。乃審計處審計分處，國稅所之設立，並本年一月八日各組織令，文官任免執行令，輒爲官制官規，竟不待參議院議決，公然以命令公佈施行。違法者一。臨時約法第六條第一項：「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第二項：「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乃京師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之身體，及侵入搜索人民之家宅，多出軍政執法處。軍政執法處並非依法律管設立之機關，而有逮捕拘禁人民身體及侵入搜索人民家宅之事。橫行無忌，甚至予人民以鎗斃之刑，尤非法律所許。違法者二。臨時約法第六條第三項：「人民有保財產及營業之自由」；第四項：「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乃目今竟有軍警圍捕國風日報，搜索北言通信社文件，停止國光新聞發行，解散省議會聯合會各事，是於人民財產營業言論著作刊行集會結社之自由，侵害靡遺。違法者三。臨時約法第六條第五項：「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刻京師上海等處，往往禁發明電及密電，往來書信，往往檢查開拆；是侵人民之書信秘密之自由。違法者四。中國銀行則例第三十條：「中國銀行受政府之委託，經理國庫及募集或償還公債事務」。乃本年五月三十一日財政部佈告第三號，以代理金庫委託交通銀行。以部令變更則例，而委託金庫於交通銀行。

違法者五。臨時約法第十九條參議院之職權第一項：「議決臨時政府之預算決算」。乃臨時政府元年六月至今年六月之決算，並無提出。本年一月至六月之預算，概已支出，今始提交國會；且祇有中央之預算，並未有各省之預算。違法者六。而違法之甚者，尤莫如此次之與國借款。私自結約善後借款，擅行簽押。查臨時約法第十條參議院職權第四項：「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民國憲法未定以前，臨時約法所定參議院之職權，為國民議會之職權。是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國會未成立以前，其議決之職權在參議院；國會成立以後，其議決之職權在國會。國會於本年四月八日開院，凡有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在四月八日以後者，當然先由國會議決，始得發生效力。約法具在，萬不可違。乃政府與國借款及五國團借款，則悍然違背約法而不顧。與國借款額數三百二十萬鎊，抵押品為稅契。政府私與國定約，毫不使國會與聞。迨本院議員提出質問書，猶復延不答覆，及催促國務員出席答復至再，始於本年六月二十五日由代理財政總長出席，受議員嚴行質問，方認於本年初十日已私與奧國簽約。至五國銀行之善後借款二千五百萬鎊，未經國會議決，竟於本年四月二十七日擅行簽字。查此案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政府在前參議院報告，事前未經大總統依法提出，事後參議院又無咨復文書，何得重譴前參議院已經表決通過？且是日議事錄載明財政總長周學熙報告事件，當日對於借款事，止有報告，並無議案。周總長報告二十一條件，止五條特別條件有條文，餘普通條件十六件僅有大義。當時院內將特別條件五條表決，其大體不逾示政府以交涉之範圍。普通條件

尙無條文，何所謂通過？欲於五月初五日衆議院質問，段代理總理出席答辯，及至辯無可辯，乃行自認手續未完。夫以未經國會通過，而擅行簽字，如此手續未完，非違法而何？至若借口倍克立公司借款簽字後，始提請參議院追認，及海關借款簽字後，始正式咨照參議院備案之先例，以爲違法之辯護，則益見政府之心不可問矣。蓋臨時約法參議院止有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之規定，並無事後追認之條文。令政府冒天下之不韙，對於倍克立及海關借款，不先送參議院之議決，既已蹈違法之罪；乃不自引咎，竟乘國會之初開，反借口先例，明目張胆，破壞法律。是政府無時不可開先例，即無時不可以先例蹂躪。法律根本動搖，何以立國？是尤吾人民忍無可忍者也！夫國基初定，風雨飄搖，政府即守法奉公，力謀國利民福，猶恐千鈞一髮，任重難艱。矧便一己之私圖，置國家於度外，奉個人之意旨，視法律爲弁髦，值承平全盛之時，縱短汲深，尙虞弗濟；處國步艱難之日，水深火熱，安望不危？嗟乎莽乾坤容此濁流，蒼生何託？好山河等語孤注，亦縣將沈！苟非急起更張，決難返亂爲治。用是臚陳政府失職違法舉筆大者，謹依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二項，提出彈劾，俾國務員全體一律罷職。是否有當？即請公決！

十 討袁失敗出亡在日本

宋案發生以後，袁世凱要進行大借款的原因，一方面是爲了收買議員政客和輿論，另一方面則運動軍隊，以及各處佈置爪牙。到了羽毛豐滿，就想去掉各省國民黨的督軍省長。當時廣東的是胡漢民先生，爲黨出力最大，尤爲袁所忌，想首先除去。記得宋案和大借款案鬧得非常熱烈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大約十二點鐘光景，那個廣東來江紳直衝入我的臥室。那時我正熟睡，他把我鬧醒，就坐在床邊上，鬼鬼祟祟地向我說：『我和你都是慶存的好朋友，現在總統要使競存代替展堂（胡漢民的號），很希望你能夠贊同；同時請你打個電報給競存，叫他千萬不要推辭』。我立刻答：『你若要廣東安靜，大局安靜，這事千萬不可做。去年我到京時，總統和燕孫曾再三對我說過這個意思，每次我都表示反對。現在大局危機，真如千鈞一髮，若此事實現，恐怕我國難免糜爛』。江紳還糾纏不已，我却堅決拒絕。

他去了以後，我想禍亂恐怕不遠了。果然不久，袁突以命令免了胡漢民，李烈鈞，柏文蔚和譚延闓的職。代胡漢民的就是陳炯明。我立即打一密電給陳炯明，勸他不要上袁的當，電文結句說：『心縱無他，人言可畏，萬毋忘去冬西窗剪燭慷慨論生平語也』！陳接電後，即交給胡先生看。原來胡陳接退，已有預約，於是共同回我一電，大意說：『這次更接，不特於大局無礙，而且有益』。我心裏也就明白了，暗暗笑道：『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後來友人告訴我，胡先生見了我的電報說：『去年人說海濱爲競存謀都督省長，現在證明其全非，可見我信海濱，却沒有信錯』。

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先生在湖口宣佈獨立討袁。我早就爲袁所注意，到了這時，我知道他要設法

對付我了。果然不到數日，有一天早上，我照例習書方畢，正擬早餐忽見張耀會先生匆匆而來。我請他用早飯，他說：『我就要走，但是有句話要同你說』。他擠到我的耳邊低聲說：『今早袁已下手令陸建章捉你和印泉（李根源的號），交一秘書親自送去。這個秘書是我們的同志，所以叫我來通知你，務須於今日離開北京；他擬把密令壓到今晚再送往隱處。印泉已有人通知，你快些預備罷』。說完他便走了。

我才想起，這幾個月來，看見門房雜役一天一天地闊綽，有時還聽見他們打電話到國務院秘書處，可見老早已爲人收買。回憶從事革命時，爲怕走漏消息，就絕對不用下人，因此同志們自己煮飯，自己燒菜。不想民國成立後，還要提防；而這次不小心，幾乎等於爲自己設了陷阱，知道非設法逃走不成的了。於是早飯後我叫了一個雜役去買了十幾把絹扇，一口氣寫完，到了中飯後，叫了所有的雜役，吩咐他們送到較遠的地方，預算非到晚上不能夠回來。留下的祇有一個門房，兩個車夫，我就叫他們打電話，約四個人來打牌。不久，到了三個，我和他們先打起來，雜役都已出外，就叫門房和馬夫進來照料。當時我故意拿出許多錢，擺在面前。打了一會，第四個來了，我請他代我把所有的錢都交給他。我若無其事，左手拿一本很精緻的詞集，右手搖一把絹扇，踱出門去。馬夫問是否要車子，我對他說：『我到隔壁盛慶會館去看朋友，你們好好地招待客人』。我走到街口，叫了一輛洋車，直赴京津車站，買了一張三等票，混入人叢，剛好開車，我才放心。我到天津的第二天晚上，陸建章派兵到公餘俱樂部捉我，但不知道那個是我，就在那兒等我回來的十幾位議員捉去。陸建章親自出來辨認，看見我不在裏面，同時國會也提出抗議，祇好把他們全數放了。

我由天津到上海，長江各省和福建都已相繼舉旗討袁。總理叫我即日回粵，協助陳炯明。我回到潮州的時候，陳炯明早已宣佈獨立，正在出兵援贛。那時長江上下游的討袁軍，大都先後失敗，廣州燕塘砲兵也有不穩的消息。這部份砲兵是北伐軍遣散後所餘下的，人家以解散北伐軍係爲陳所迫來煽惑他，所以爲他所動，陳即託我到香港找姚雨平先生回來設法。我到香港的次日，龍濟光突然自梧州出兵攻贛州，黃士龍又在廣州收買軍隊作內應，加以燕塘砲兵營兵變，於是廣東討袁軍也失敗了。陳炯明等陸續到港，我就和他們策劃收復廣東的計劃。但是他們爲港政府所不容，大家都被迫而走了。我便獨自負責辦理。龍自佔了廣東後，無惡不作，復歧視粵籍軍隊，甚至於黃士龍亦爲所迫。我派人到赴各方聯絡，頗爲得手，遂決定僱曆八月十五日晚十點鐘，並以廣東警察廳長陳景華爲發號人。那時我住在妙高台；晚上等廣州來的消息，直到十二點鐘，心焦之至，就同莫紀彭及陳其尤去戶外賞月。祇見皓月當空，萬里無雲。驟然間，忽見月光沿邊，發出各色光芒，逐漸擴大；不一會，遮滿天空。這光芒具有世間所有的寶彩；而世間的寶彩，皆無其比。因想到世人說八月十五夜看月華，這一定就是月華了。到了次日，曉得這次因事機不密，龍於十五日傍晚，藉口商討機密要公，請陳去談話。陳到後，被龍設計騙去所佩的手鎗，遂爲槍斃。「當場處死」。其他部隊見陳的信號不至，不敢發動，硬告失敗。但我還想再舉，復派陳銘樞同志潛入廣州，主持聯絡軍隊事宜；因爲陳是欽廉人，而那時欽廉籍軍人散佈於各地的很多。陳以同鄉資格，較易入手。但陳又被捕，幸賴他同鄉軍官多人力保，始獲釋放。

這時袁的力量，已能支配全國。我以爲苟袁能逆取順守，把中國弄好，我們又何必妨讓他去。而且天地之大何處不是我們用武之地呢。所以我有海外經營的念頭。因念安南數千年來，本爲我國土地；而

自割與法國之後，當地人民又非常痛恨。於是我就派劉顯丞，譚啓秀，和范其務調查安南北部，蕭文贊調查南部；並且買通一艘由港到安南的船，可以爲我運械運人。調查結果，雖然知道安南一般的人，尤其是年齡大的，都念念不忘中國，對法國人的感情很壞；但同時又發覺不少的安南青年，已中了法國懷柔政策的毒，替法人張目。知道一時不容易實現我的理想，而非先做準備工作不可。因此勸蕭文贊在西貢堤岸辦一個小學，藉此散佈革命思想，和聯絡安南人士。直到洪憲之役，因須集中人才，不得不叫蕭文贊回來；便把經營安南的事，暫告結束。

我討袁失敗，逐龍無成，海外經營的計劃又祇能做些預備工作，於是決定前往日本。

我由香港化名到上海，再由上海搭船到長崎，爲秘密起見，改乘火車先到橫濱；在那兒住了一晚，然後改坐電車到東京，以爲這樣決不會被人發覺。那知到了住所祇有幾盞燈點，就有日本警察來查問，同居的人說沒有，警察回去了又來，詳細說出我由長崎到東京的路線，絲毫不錯。我知道無法隱瞞，就出來見他。警察聲明並無他意，只是爲了要保護我。以後每一星期，就有一個特別警察來問問。

到了日本以後，我就準備長期讀書的計劃。因爲一個人不能爲國家社會服務時，就該爲自己做工作；而自己做工作，也就是將來爲國家社會服務的準備。當時認爲自己讀書，還是有所觀摩較好，遂入了早稻田大學研究班。大學當局對我很客氣，給我一個特別研究生的名義，可以隨便上那一班的課，也可以隨便請那一位教授指導。在法政學堂時，雖然我讀過日文，還常常聽日本教授講書，但事隔數年，可說已經完全忘記。於是另請一位先生，每日到住所教日語。爲了實習起見，就將俄國鮑爾多金所著關於中俄西北問題的日文譯本，全部譯爲中文。後來谷鍾秀先生在上海辦雜誌，來函索文稿，我那時無暇另

作他文，祇好將譯文寄去，在該雜誌分期發表。但是這實在是我平生最不滿意的文字，因為我志在學日文，所以一切用直譯的緣故。

我住在日本時，覺得最不便的是飲食。因為日本飯，大都是冷食。幸而我派往日本留學的，如蕭冠英，范其務，何春帆和林仙使各同志，都住在一起。他們自告奮勇，又實行革命時的生活，來和我燒中國菜。結果他們的上課時間比我多，反要我自己動手。但在異國能夠吃到家鄉味，也是口福不淺；而且非常節省，每人每月不過分派到二十餘元。

同盟會自改為國民黨後，官僚政客，投機份子，紛紛加入，內部異常混雜；到了二次革命失敗，却恢復了原形。同時本黨同志，有些也心灰意懶，以為在最近數年內，無法進行革命。總理却認定袁世凱必將在短期內謀帝制，非積極進行革命不可；若要革命，必須從整頓黨務入手。遂於民國三年組織中華革命黨。

有一天，總理派人來叫我。我立刻去見總理，他說：『本黨決定創辦一種雜誌，做本黨宣傳的機關，你可否騰出一部份讀書的工夫來做文章？』我答：『先生（當時我們稱總理都稱先生）命我做的事，決沒有不樂從的道理』。總理說：『那末很好，不過我先要告訴你關於目前本黨宣傳的方針。現在本黨宣傳的對象，要在推倒袁世凱。你在北京的時聞較久，對於袁世凱倒行逆施的情形比較熟悉，應該把牠盡量揭發出來。如時間許可，每期你要担任兩篇，至少也該有一篇。至於黨義的宣傳，可暫從緩，因為國賊未除，什麼主義都行不通』。我答：『我當盡力為之』。

後來民國雜誌便出版了，總編輯是胡漢民先生，發行人是居正先生，編者除我以外，還有朱執信，戴季

陶，邵元仲，田桐，蘇世殊，葉夏聲諸先生，因為要違行。總理囑我每期至少做一篇文章的訓示，我就停止到早稻田去上課；除在密讀警外，概不干涉他事，却把時間完全花費在做文章上面。所以民國雜誌的創刊號，我就發表了「袁世凱之約法會議」和「中俄協約的結果」兩篇文章。不久看見國內某雜誌的批評，對於民國創刊號中朱執信先生的「生存之價值」和我的「袁世凱之約法會議」認為非常切要。以發民國雜誌每期刊版，我至少有一篇文章。但現在有底稿的是很少了。

自民國雜誌發行以後，黨人獲得了指導，國人也認識袁世凱的誤國害民。但是黨人到日本後，為袁世凱所忌，常常想法子向日本交涉，不許我們在日本居住。為避免麻煩計，我們在民國雜誌上發表文章，都用化名，我的是一「亞蘇」。所以許多文章裏引用我自己以前說的話和發表的文字，還註明鄒魯所云等字樣，就是這個原因。

民國雜誌出版了幾期，歐戰爆發。總理派各人去南洋籌款，和到國內發動革命，因此雜誌就不停刊了。

當時我回到香港，策動倒袁。在我離開日本的時候，我自己想想，已經三十歲了，便寫了下面一段岳武穆的詞以自傷：

「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空悲切！」

少年
的
問
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初版

少年的回顧

全一冊實價十八元整

著者 鄒魯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香國寺上首

正中書局

重慶中一路二一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處

本書負責校對人 邵寒如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字第四七五號

274221



8-18.20